



中评周刊 | 第 82 期目录

专题 | 媒体是社会公器，性质不可偏移

1. 乔恩·布尔斯廷：《总统班底》诞生记 P. 2
2. 本·布莱德利：水门事件之后 P. 16
3. 资中筠：实现舆论监督的奋斗史 P. 25
4. David Kaplan：定义“调查新闻”这门手艺 P. 32

观点文章

1. 茅于軾：中国经济中的逻辑 P. 35
2. 盛洪：宏观税负越来越高 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 P. 39
3. 张干帆：如何防止警察性骚扰？ P. 41
4. 冯兴元：“公地的悲剧”与自主治理的逻辑 P. 43
5. 科斯：中国改革没邓小平 将完全不同 P. 47

随笔散记

1. 茅于軾：怀念余大章老师 P. 59
2. 丹·桑切斯：不向邪恶低头的米塞斯 P. 61

读书

1. 茅于軾：也谈《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P.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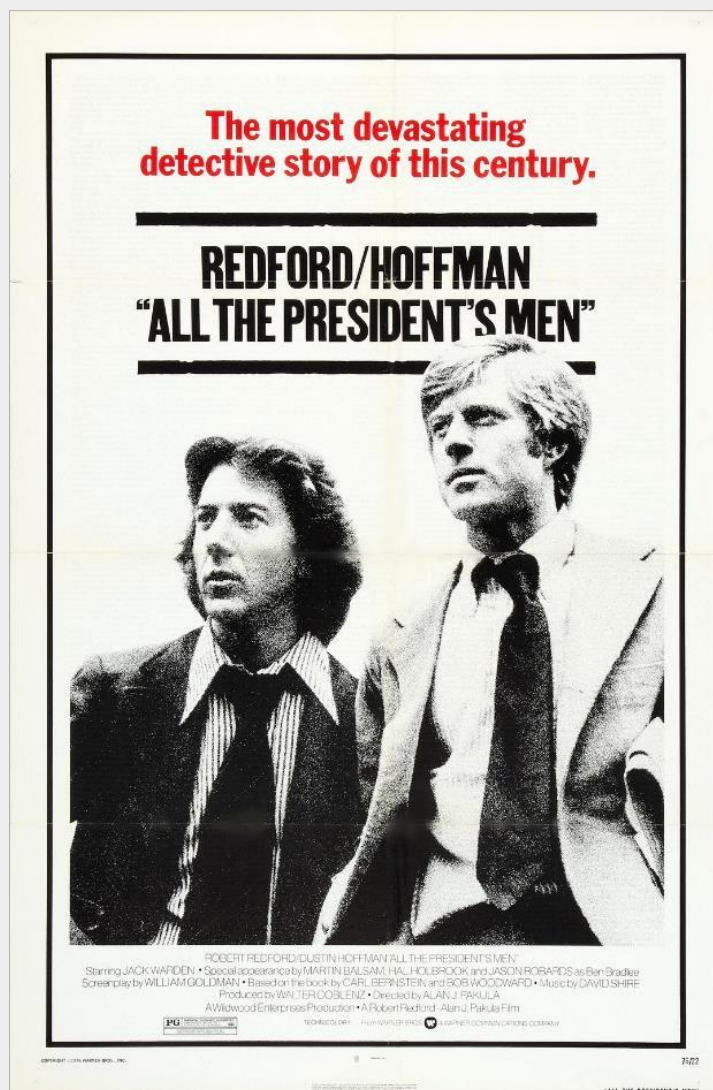
预告

1. 茅于軾教授九十岁寿辰学术庆祝活动众筹 P. 71
2.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73

订阅 | 往期下载 P. 75

乔恩·布尔斯廷：《总统班底》诞生记

[乔恩·布尔斯廷 Jon borsten, 导演、编剧、制片人、作家, 曾担任《总统班底》的协同制片人。作者于2016年为纪念《总统班底》上映40周年所撰写的幕后制作笔记, 首发于《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杂志。译者为梁圈圈, 本文收录于《好莱坞之眼》, 转载自豆瓣]



影片《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 海报

1976年由艾伦·帕库拉执导的美国政治题材影片，故事改编自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同名原著；影片再现了当年《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是怎样透过深喉的帮助，揭发水门事件而致尼克逊下台的经过

如果你在电影这一行工作过，就会知道拍一部像《总统班底》这样出色的电影是怎样的奇迹，它不可思议地组合了才华、机遇、合作、自我、信任、权力、运气。然后，还需要更多运气。

正如评论家宝琳·凯尔所说，罗伯特·雷德福喜欢拍“如何”类电影——如何成为一个政治候选人、一个登山运动员、一个滑雪运动员——那种聪明、可信、低调的，没有好莱坞式浮夸和矫饰的电影。

他被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水门事件文章迷住了，他想让自己成为一名调查记者，于重重阻力下揭露现实，将记者们不懈的努力载入史册。哪怕他不演都可以。

回顾制片厂门口堆满剧本的年代，对一位电影明星的最高赞誉是“他能让制片厂用电话簿拍出一部电影”。如果说这句话适用于形容什么人，那就是 1974 年的罗伯特·雷德福。但当他告诉制片厂他想拍《总统班底》时，大多数人说他们宁愿拍电话簿也不拍这样的电影。最终，这个项目落在了华纳兄弟公司手里。

不过华纳兄弟也有顾虑，他们指出，人人都知道水门事件的结局。雷德福回答说，这不是关于那个弥天大谎的故事，而是关于两个画风迥异的“混搭”搭档——一个白人新教徒（WASP）和一个激进的自由派犹太人——共同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毕竟，雷德福已经拍了这个年代的终极兄弟情谊片《虎豹小霸王》，还有典型的白人新教徒和犹太人“混搭”的《往日情怀》。华纳兄弟的人说，但那部电影里有芭芭拉·史翠珊。这个片呢，女孩在哪儿？枪在哪儿？“报纸、打字机、电话，不行，华盛顿，不行不行”。于是，拍了紧张刺激的 CIA 片《秃鹰七十二小时》的西德尼·波拉克告诉他们，这是一部关于“程序”的惊悚片：两名孜孜不倦的新记者是如何逃脱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的控制，把他打倒的。

然而，华纳兄弟并没有被说服。人们不仅知道这场创伤是如何结束的，还经历了每一个转折。华纳兄弟通过市场调查证实了自己的担忧。他们了解到，一半观众打算对这部影片进行恶毒攻击，并觉得自己肯定会讨厌它。每个美国人都对这个故事感到厌倦，希望水门事件赶紧翻篇。想象一下，一年后这部影片终于问世时，他们会在哪里。

雷德福毕竟是雷德福，为了使这笔交易更有卖相，他请来了达斯汀·霍夫曼。霍夫曼是唯一“能让制片厂用电话簿拍电影”又愿意加盟这个项目的明星，他主演过白人清教徒和少数族群“混搭”的经典影片《午夜牛郎》。雷德福还请了威廉·戈德曼来执笔，他曾写过制片厂最爱的兄弟情谊片《虎豹小霸王》的剧本。



雷德福想要的是混乱的真实。他寻找的导演是一位能胜任粗粝的新浪潮式写实主义风格的导演。他先找了刚刚拍了《特殊任务》的哈尔·阿什比，哈尔激发杰克·尼科尔森在片中展现出了勇敢、真诚的表演。唉，不过阿什比的粗粝与这部影片不搭，他磕了药般的邈邈做派与《华盛顿邮报》的“卡其裤—领带”世界格格不入。雷德福不得不走另一个方向。于是他雇了一个上过希尔中学的耶鲁大学毕业生——艾伦·帕库拉。帕库拉不仅穿着卡其裤，还穿着西装，对潇洒的理解就是脖子上系着一块手帕。



艾伦·帕库拉与哈珀·李

艾伦·帕库拉那时 46 岁，却已被认为是好莱坞的元老。他担任过《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制片人，并且作为制片人在 12 年前雇用了羽翼未丰的雷德福出演《戴茜·克洛弗的内心》。对于一位成功的导演来说，这不是普通的起点。优秀制片人的诸多才华中，有管理才能的一面比启迪灵感的一面更重要。帕库拉曾经强调不想涉足导演行当，但是制片人“遥控现场的魔力”已经消失了。就像帕库拉所说，在拍摄某部电影的第一天早上，他发现自己堂堂一个制片人居然在萨克斯为剧组买衬衫，心想：“这太扯了”。

于是，他雇用自己担任导演。他哄着新演员丽莎·明奈利靠《何日卿再来》中一个脆弱的怪人角色获得奥斯卡提名。随后，他在谋杀题材的悬疑片《柳巷芳草》中指导简·方达扮演一个高级应召女郎获得奥斯卡提名，他还指导沃伦·比蒂在《视差》中扮演跟踪偏执杀手的记者。对《总统班底》这部以表演为重的政治惊悚片来说，他有很好的资历，又有在无国界记者午餐会上与本·布拉德利（水门事件时

《华盛顿邮报》总编) 谈笑风生的风范。

我被聘为艾伦·帕库拉的助手，但是职责并不明确。我曾经是他拍《视差》时的 AFI 实习生，周薪只有 50 美元。他在我身边过得很舒服，拍摄完那部电影后觉得我还是挺有用的，就一直留我到后期制作阶段，并给了我更实在的报酬。

帕库拉对好莱坞传统有深刻的理解，他将其精华部分带进了这个剧组。他把雷德福从复制某种纪录片现实感的想法中拉了出来。他说，这不可能是一部纪录片，即便拍了，也没有人愿意看。好莱坞已经创造了一种升华世俗的艺术，而这正是电影明星的生存之道，这种艺术让日常生活有了超越性。

“抓好你所拥有的吧。不要染头发。你是罗伯特·雷德福，这就很有用！水门事件对美国来说是划时代的一刻。让我们在每一帧中感受它的重要性。”是的，观众必须相信，但这重要性也须传达出去。这就要靠好莱坞的艺术形式。

首先，观众必须相信，你怎么说服他们？新闻编辑室布景中办公桌的颜色与现实中的那种橙色调一致，这确实会带来改观。演员会更相信电影的真实性，观众也会放松警惕。帕库拉和雷德福决定精确捕捉足球场大小的新闻编辑室的细节。我们要把《华盛顿邮报》编辑室复制到华纳兄弟公司的摄影棚中，用从原版办公室运来的“废物”装饰它。这个报社的真实性大大得益于此。



办公室场景

我们的美术设计师之一乔治·詹金斯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曾参与过帕库拉的其他影片，他从 1946 年《黄金时代》开始，成为一名美术指导。但是《总统班底》需要新的面貌，一个原原本本的真实。我们有 160 个记者办公桌（真实的记者办公室有 180 个），詹金斯希望每个工位都反映一位特定记者的个性。他可以指望布景师乔治·盖恩斯做出 20 到 30 个这样的工位，不过剩下的就会开始重复了，那会让人觉得虚假。詹金斯想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他给“邮报”编辑部的每个桌面都拍了一张照

片，把它们打印成 8×10 英寸大小，然后分别放在摄影棚对应位置的顶层抽屉里，让盖恩斯仿制出来。

我的一大部分工作是帮助帕库拉让一切显得真实。为了研究开场展示水门事件的段落，帕库拉派我同当时逮捕窃贼的便衣警察一起进行夜间巡逻。我听了他们对事件的描述，把它写下来，最终影片中呈现的差不多就是那样。他们给了我一个所谓的“真正的独家新闻”。

如果你愿意的话，想象一下：水门事件的谜团，正如媒体所塑造的那样，是从泄密的胶带开始的。我们的剧本也是从这里开始。水门大厦的非裔美国保安弗兰克·威尔斯（故事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在楼梯入口处的门把手旁发现了一片胶带。他上前检查。啊哈，有人用胶带贴住打开的门锁，破门而入了。他们还在里面，不然胶带就不在了。保安拉出了对讲机的天线。探员来了。那小段胶带和这个安静、目光敏锐的人打倒了总统。如果没有他那敏锐的目光，窃贼们就会继续干他们的脏活，尼克松就会安然无恙地统治。这位保安维护了联邦。我们不是很幸运吗？我们有很多弗兰克·威尔斯，维护我们的安全。

影片的开场中，弗兰克·威尔斯扮演他自己。我们首先在一个远景镜头中看到他小小的侧影。记住，这个镜头是为大银幕而作的。

帕库拉接着去拍摄泄密的胶带，他给了威尔斯一个本片中最大的特写镜头。他说，如果我们不这么拍，人们会认为我们错了。但我觉得，他的真正意图类似于《双虎屠龙》中记者对詹姆斯·斯图尔特所说的：“这里是西部，先生。当传奇变成事实时，要刊登那个传奇。”

IMDb 上威尔斯先生的生平是这样写的：“尽管他因出色的保安工作而闻名，但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他却长期无法找到稳定工作，一直生活得相当贫困，直到 2000 年死于脑瘤。”

虽然在片场大家都知道雷德福是那个在创作和财务上做最终决策的人，但在那个时代，演员通常不能挂制片人头衔，雷德福也没有打破先例（但片头写的是“A Robert Redford-Alan Pakula Film”，双作者，雷德福排在导演前面）。如果《总统班底》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那么收藏小金人的会是能干、尽责的沃尔特·科布伦茨，而不是罗伯特·雷德福。我必须经科布伦茨面试才能得到这份工作。写了《本能》《歌舞女郎》以及一个用克林顿阴茎口吻讲述的新闻报道体文章的编剧乔·埃泽特哈斯评价我“非常理智、思维偏抽象”，我想他是对的。沃尔特不知道该怎么用我，但我是帕库拉选进来的人，他又能怎么办呢？但他确实希望明确一件事：“这个片子没有更多制片人头衔了。别想了。”

雷德福认为，拍摄一部《总统班底》的幕后纪录片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而且要拍成“真实电影”风格——雷德福没找来帕库拉时，就希望《总统班底》呈现这种风格。科布伦茨给了我拍这部纪录片的时机。我刚刚拍完一部关于旧金山市“科博馆”的纪录片，还拍过一部关于年轻的弗兰克·盖里教五年级学生学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纪录片。科布伦茨想，如果必须有一台摄影机跟拍雷德福，不妨让一个铁定要进组的人来拍。

好机会！我来拍一部由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影片。一个诱人的元主题，一部关于“由讲述真相的书改编的讲述真相的电影”的电影。但我知道，如果我肩扛埃克莱尔摄影机跟拍他们，

这些电影专业人士就会把我拒之门外，我拍不到那些不讨人喜欢的、有争议的、脆弱的场面，而那才是有意义的东西。他们是专家，会给我们他们想要的东西。即便我成功地挖得更深，雷德福也可以轻易拿掉他不喜欢的东西。作为一个持摄影机的人，我会沦为一个宣传工具。

但实际参与《总统班底》的制作则是个完全不同的机会。我会进入好莱坞帝国电影制作最好的那部分，会在内部体验它。我 27 岁，年纪不小了，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来。是的，这是我在真正的电影行业抓住机会的小小立足点，万一成功了呢？我看到了大局，拒绝了花絮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他们雇用了吉尔·戈米洛，一位优秀的导演（代表作《安东尼娅：一个女人的肖像》），但她待了一段时间后也退出了。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帕库拉营造真实感。我负责找片中用的新闻视频，为帕库拉提供每场戏对应的报纸文章。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新闻编辑室现场待命，努力成为帕库拉需要的人，并观察一切。我和掌管秘密的人——场记成了好朋友。制片人让她密切注视现场发生的一切；演员们排练时，她负责为帕库拉做详尽的笔记。这位满头银发的卡伦·伍基是个“好莱坞二代”，她是演员艾伦·黑尔的女儿，但她的举止和言辞却像从七大女子学院（Seven Sisters）走出来的。她冷静，热心，绝对可靠，细致，周到。我们聊了很多。

她脖子上挂着秒表，记录当天发生的事以及每件事消耗的时间。我们在华纳兄弟的摄影棚度过了 80 多天，大部分时间是在“邮报”布景里。伍基说，当我们准备好拍摄时，霍夫曼就会出现在现场，打扮妥当，做好准备；雷德福则会晚来，因为他是自己项目的真正制片人，所以只对自己负责。但他一出现，就要立即准备开拍了。霍夫曼则从没有这么匆忙过。他可能不是制片人，但绝对是明星。他一定要试一些东西，直到找到那场戏的感觉。也许只是巧合，但伍基注意到，雷德福迟到多久，霍夫曼之后耗在即兴表演、试验和准备上的时间就有多久。

唯一可能打破这种模式的人是帕库拉。给团队带来秩序，不正是导演的工作吗？伍基计算出，迟到和“报复性”即兴表演加在一起，有一周的拍摄时间那么长。这意味着多出整整一周的花费，包括场景、群演、摄制组和雇用至少 60 名片场工作人员的费用。如果摄制组对明星有对抗情绪，就会浪费时间，导致士气溃散。他们所有的工作都会用掉更长的时间。

但帕库拉并没有对此大惊小怪。他靠热情、耐心和幽默便度过了难关。他能让每个人都始终专注在工作上，把一场可能是毁灭性的意志之战变成了建设性的合作。如果他的方法在 60 天拍摄日的基础上超时了 6 天，你可能称之为用 10 % 的额外支出解决了明星的自尊问题。这种事我不可能捕捉到那部“流产”的纪录片里，但这正是帕库拉的重要贡献。这才是好莱坞导演。

排练是封闭的，但我时不时也会看到主要演员质疑剧本。当一场戏涉及敏感的采访时，帕库拉必须确保每个字都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报道一致。戈德曼基本遵循了原著，但他有时会稍加修饰，他喜欢伙伴间的嘲讽，喜欢用巧妙的俏皮话来结束一场戏。帕库拉和演员们把这些都删掉了。霍夫曼

说：“想一想，现在我们改了剧本，而戈德曼将是那个拿奥斯卡的人。”戈德曼真的拿了奥斯卡。

我们的叙事违背了传统的戏剧规则，比如《聚焦》那种。在《总统班底》中，个人生活不是故事的一部分。拍摄时我们自己也不太敢相信可以这样。

我们其实也拍了两个记者在华盛顿开车时相互敞开心扉的戏。伍德沃德讲述他小时候如何发现再婚的母亲给继兄买的圣诞礼物比给他的贵——这是他的第一份“调查工作”。那些时刻并未出现在银幕上。后来，在霍夫曼的坚持下，我们还拍了伯恩斯坦的女朋友抱怨他忽视了自己的戏。那是摄影师戈登·威利斯唯一请病假的一天。威利斯知道那些戏不属于《总统班底》。这里没有痛苦的恋人、妻子、孩子、女朋友，也没有忧心忡忡的父母。只有记者在工作。甚至连坏人也不在场，他们只是来回提到的名字，偶尔出现在电视画面中。这个故事只有一个重点，一个修行般纯粹的目的。

戈德曼对这个故事的关键有清晰的判断，非常了解如何将素材组织在一起，来营造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因为线索是断开的，只有在事实得到确认后才汇聚在一起。但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是知道电影该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知道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弗兰克·威利斯发现了胶带。但是故事未来的走向如何——现实中的解决方案，尼克松的辞职，这些都不涉及我们的记者。我曾力荐一个剧本中没写的结局方案，让影片结束在记者们突破法律的限制，接近西里卡法官的大陪审团成员时。记者们被检举到法官那里，法官召集所有记者，告诉他们唆使大陪审团成员透露信息是藐视法庭。他没有特别提到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但他可能会，那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后其他记者试图找出是谁干的，并盘问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而我们的主人公则用半真半假的逃避的方式——他们记者圈子里所谓的“不否认的否认”策略回答。现在记者们也知道了受到这样的待遇是什么感觉。这个精彩的反讽反映出更大的真相：无情的记者和无情的政治家基本上是同一种动物。

这是个可怕的坏主意。我们拍的是美国神话，这两个记者是我们的英雄，这个故事是关于他们带来的改变，而我的结局恰恰否认了这一点。政治家和记者可能有着相同的本能，但他们没有相同的道德观。戈德曼的结尾就非常巧妙，他让故事结束在我们两位小伙伴似乎正处于低谷的时候。伯恩斯坦误解了消息来源告诉他的事情，认定尼克松在白宫的得力助手霍尔德曼与大陪审团有牵连。但霍尔德曼并没有。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刊登了这些错误的信息，增强了敌人的力量，威胁到了自家报纸的生存。但这是一个无心之失，他们的主管布拉德利力挽狂澜：

“你们可能很累了吧？这当然了。回家吧，好好洗个热水澡，休息 15 分钟，重整旗鼓。我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你们让我们承受这些的。**没有什么在这之上——除了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也许还有国家的未来。**并不是说那些有多要紧，只是你们要是再搞砸了，我会很生气的。”

接着，两位记者用打字机讲述他们的故事，而同时电视上尼克松在宣誓就任总统。我们讨论了观众在灯光亮起之前看到的最后一幅画面。当时有个版本是这样的：尼克松乘飞机从白宫草坪上起飞，透过直升机窗口挥手致意，直到消失在华盛顿纪念碑后面。剪辑师鲍勃·沃尔夫——一位真诚的共和党

拥护者——讨厌这个版本。他称之为“打脸镜头”。我们本来准备先做内部试片，实际直接进行了第一次试映，他是对的。我们低估了精心衡量过的克制对观众情感的冲击。在这部电影的上下文中，那感觉就像幸灾乐祸。

所以，我们让影片结束在打字机敲出大写字母上：

尼克松辞职。杰拉尔德·福特今日中午将成为第 38 届总统。

戈登·威利斯已经为帕库拉掌镜了《柳巷芳草》和《视差》，并刚刚完成了《教父 2》。《教父》系列呈现的风格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种情绪化的光晕，挑战了颗粒斑驳的新浪潮电影，并重塑了好莱坞的神话形象。帕库拉制片人的一面不仅信任威利斯的画面质量，还信任他为影片设计的视觉结构。帕库拉会滔滔不绝地说他想传达的大致感觉，威利斯则将这种感觉转化为画面。当帕库拉安排一场戏的调度时，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比如说特写镜头，然后威利斯就会选好机位。威利斯是一个真正能在头脑中看到这个故事的人，他精确地了解每一个画面怎么与其他画面环环相扣，以构建故事。他从不变焦，因为他觉得改变焦距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视角，从而破坏影片的空间。当戈登横摇或俯镜头时，这种运动必然是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于你根本感觉不到运动的存在。通过限制“镜头词汇”，他强化了画面的意义。海明威说，文字是冰山，只有八分之一浮出水面。威利斯的画面便是冰山。

他得在电话和打字机的戏中找点紧张感。他通过克制运动营造了紧张氛围。虽然大多数对话电影都喜欢让镜头随着演员谈话而移动，但威利斯却恰恰相反。在新闻编辑室的场景里，他直到 20 分钟后才移动摄影机，这发生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结成搭档那场戏的高潮部分：愤怒的伍德沃德看着伯恩斯坦重写他的那份稿子，当他最终走向伯恩斯坦时，摄影机终于和他一起移动。随后摄影机又不动了直到本·布拉德利出现。我们第一次通过雷德福的目光看到他，玻璃办公室里的一个小小身影。然后随着他走出办公室，我们跳到更近的景别，和他一起大步穿过新闻编辑室，直到他走近成为特写。在整部电影中新闻编辑室场景里我只数出了四个跟移镜头，都是在故事的关键时刻，用最长、最快的跟移镜头将影片推向高潮。伯恩斯坦在新闻编辑室远端的一间办公室里得到了关键消息的最终确认后，镜头跟着他，他一边小跑着，一边经过伍德沃德，叫他一起去堵刚进电梯的布拉德利。这是一次直线移动。

这个镜头的作用说小很小，略显突兀，没有特别的情感重量；说大也很大，它让观众在一个静态新闻编辑室体验了 90 分钟后，燃了起来。

为了保持新闻编辑室的活力，让它始终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威利斯引入了一种新的镜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镜头上加了一个分像透镜。当我们的记者在前景焦点范围内谈话时，它可以保持后景也是清晰的。威利斯和帕库拉会将打电话全程拍下来，尽量不剪切。他们最经典的镜头是让雷德福坐在办公桌前，试图查证水门事件窃贼账户名下的支票上找到的一个名字——整整六分钟。在新闻编辑室背景中，他的同事们在看电视里汤姆·伊格尔顿辞去麦戈文竞选伙伴的职务。这场戏始于中景，雷德福坐

在他的办公桌旁，背景中他的同事们围在电视机前。摄影机慢慢地、不知不觉地移动（同时摄影助理渐渐移走分像透镜），直到四分钟后，我们注意力全到了雷德福身上，这一刻他得知用于资助窃贼的钱来自连任委员会。这个镜头花了大半天时间来准备。



Dolly 运动镜头，电影化的视觉语言

大多数电影镜头以秒为单位。这里，雷德福却不得不给陌生人连打六分钟电话，还要做笔记，以此将我们吸引到不断升级的戏剧冲突中。但雷德福有演员的天赋。他能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因他关心而跟着关心。这场戏没有时间跳跃，也没有角度变化，我们体验着故事真实的节奏，并愿意相信里面的人物，甘心屈服于雷德福的魅力。

经过几个小时的斗争和挫折，我们终于拍到了一条好镜头。雷德福和帕库拉很高兴，他们做到了。这个片段，可能让人觉得停滞不前，拖拖拉拉，或做作，但它效果很好。雷德福是一个不喜欢重拍的演员。帕库拉悄悄跟他说了几句，雷德福又试了一条。他知道他已经拍到了满意的一条，于是放松下来。新增的轻松感反过来增加了张力，场面顿时紧张起来。这是他在影片中的一次胜利。

帕库拉想让阴暗的华盛顿与新闻编辑室里无情的强光形成对比。因此，针对我们的“邮报”编辑室——影片的主要拍摄地，照明策略是用清冷的荧光灯照在真实的物件上。这种照明手法是一个危险的选择，从前的电影从未那样做过。灯光又平又均匀。办公室的荧光灯缺一些光谱，并且会频闪，因此威利斯找了一种顶部的全光谱荧光灯，并制作了更小的灯管组成的灯组，这样有利于调节光强度。终于，这个房间看起来充满活力，令人难忘，而这正是帕库拉想要的。但是荧光灯不足以照亮观众从窗户外面看到的日光场景。威利斯不得不在窗户上装上一层偏绿的色纸，这样他就可以在透明的窗户上使用白炽灯。

第一次尝试，窗户闪着粉红色，这个问题花了我们好几天才解决。不过最后的成片中还是有一扇

远处的窗户略带粉红色。荧光灯也给录音师吉姆·韦伯带来了麻烦。每个高架夹具都配备了嗡嗡作响的小型变压器。于是，乔治·詹金斯把所有的变压器都放在场景外面，用单独的电线把每一个变压器都连接到它的高架管上。一共用了几千米长的铜线，嗡嗡声没有了。



雷德福和帕库拉有权力和担当，可以在小事上花大钱。我听说，本片最贵的镜头是伍德沃德在去见“深喉”的路上换出租车的镜头。帕库拉想让观众感觉到记者危险的探索与华盛顿帝国相比，力量多么微弱，所以他让伍德沃德在肯尼迪中心高耸的喷泉前换了辆出租车。只有一个镜头：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穿着不讲究的雷德福走出车外，同时穿戴黑色礼服、领带的上千名华盛顿人涌向大街，而雷德福拐进了另一条街。为拍摄那个镜头，我们在电台广播中招聘临时演员，用了整晚来安排调度。

威利斯用洒水车把街面淋得湿漉漉的，反射着光亮，这是一种黑色电影的感觉，让这场戏有了闪着光泽的深邃感。不幸的是，洒水车从喷泉处装满水，排练完终于要拍了，几乎被抽干的喷泉却自动关闭了。而天色渐渐亮了。好在器械组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重新打开喷泉拍一条，但只有一条。另外，这场戏还用了分像镜头。

如果打字机是武器，词语就是子弹。戈德曼的剧本以打字机键敲击出的日期特写开始。帕库拉希望观众能感受到每个字母的力量。为完成这段镜头，我求助了曾合作过的查尔斯·埃姆斯，埃姆斯是一位设计师，用微距摄影机拍摄非常微小的东西，他让我借用他的设备——特殊的镜头和近摄接圈，并提供他的工作室作为拍摄场地。我和一位摄影师朋友埃里克·沙里宁一起完成了拍摄。最后呈现的画面中，纸变成了一片纤维纠缠的田地，字母则像一个个黑色的深谷。

由于近摄接圈会吸收光，我们的光圈比大多数镜头大得多。为了拍摄被敲打在纸上的字母，我们把投影灯聚焦到一个点上。光束太热了，把纸烧了个洞。我们用不同的画格速度拍摄敲击的键，来捕

捉敲击动作的过程，同时要将焦点从纸张转移到键。当我把这堆混乱的素材递给剪辑师鲍勃·沃尔夫时，他吃了一惊。最终，我们一次处理几帧，将这些画面缝合在一起。你看到的打字机敲出的日期是 50 段胶片拼接而成的。

帕库拉在影片开头用了一片长达 18 秒的无声的模糊画面。他希望这一段尽可能长，尽可能令人不安。谁会在一部影片开头给观众看一片空白？观众会怀疑放映机是否在正常运转，会坐立不安。紧接着，打字机发出第一声巨响。对于每个字母，特效剪辑师都加上一个大炮爆炸般的重响——尾音被刮去，两个声音的尾部半重叠在一起——就像长鞭抽出的重响。我们当时用的是磁性胶片，所以声音剪辑是用刀片完成的。然后，我们再用相应的打字机声音（有六种声音可选择）叠加在上面。在数字时代之前，声音是由带片孔的磁性片卷记录下来的，合成之后，再以声速记录到磁带上。雷德福深度参与了音效剪辑，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研究声音效果，直到平衡和回响恰到好处，声音稳定而具有威胁感和启示性，同时又很真实。这部分混音耗时三小时。

电脑上那些字母可能看起来很小、模糊不清——它们只是字母，但请想象一下银幕上几米高的、清晰的、发出巨响的字母。

剪辑是一个神秘的过程，一件关于节奏和联想的事情。无声电影先驱库里肖夫称之为“无变化图像的并置”。剪辑过程中，大脑在连续的镜头之间建立联系，试图创造一种叙事，传达一种情感逻辑。我们能如此强烈地感知电影，是因为我们觉得电影是自己构造出来的。一经熟练的剪辑师之手，观众们就能准确地感受到电影创作者想要传达的东西。这是拍电影的本质：处理这些心理上的联系是电影带给世界的一门新艺术。不过，迷人的电影和单调乏味的电影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是不可见的。

我们拍摄时，鲍勃·沃尔夫就在现场剪片。帕库拉会让场记标记他喜欢的镜次，沃尔夫以场记卡伦·伍基的笔记作为指导，把镜头拼在一起。帕库拉对每天的样片和他脑海中想象出的这部电影都很满意——有好的表演，还有威利斯出色的摄影。然而，在看到银幕上呈现的一切之前，你不可能知道影片究竟是什么样子。他预料到初剪样片会十分冗长，因为沃尔夫会努力用上剧本中有的一切内容。但是帕库拉相信自己能把它精简下来。

当帕库拉终于看到初剪样片时，他沮丧地离开了。帕库拉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拍了一个枯燥、复杂、乏味的新闻报道故事。影片很难让人入戏，也很难让人关心里面的人物。也许，那些聪明的投资人一直都是对的。然后，帕库拉又看了一遍，在斯廷贝克剪辑台的屏幕上一卷一卷地看。这次是我和他一起看的。鲍勃·沃尔夫是一位出色的剪辑师，曾与山姆·佩金帕合作几部电影，包括《亡命大煞星》。他剪片是佩金帕教出来的。佩金帕喜欢用交织的短镜头赋予影片能量和节奏，用重叠的对话把我们从一个镜头带到另一个镜头，他称之为“流畅化剪辑”。沃尔夫在《总统班底》里也是这么干的。但帕库拉想要的恰恰相反。他想让你感觉到剪辑点的存在：“如果我想把演员放在同一个镜头里，我就会把他们放在同一个镜头。”帕库拉依赖每次剪辑造成的紧张气氛和距离感。比方说，当伯恩斯坦问簿

记员一个问题时，我们会停留在这一刻，与他在一起期待答案。

帕库拉让剪辑师去“玩”这种不确定性。沃尔夫把所有镜头的头尾留白都加了回来，恢复了帕库拉在片场看到的停顿。戏顿时活了起来，紧张的气氛吸引着你进入故事中。这个版本确实更长了，却让人感觉更短。戈登·威利斯把控了《总统班底》的外观和视觉结构，而帕库拉在剪辑室塑造了观众的感受。

帕库拉说，剪辑是电影制作中他最喜欢的部分。他喜欢一遍又一遍地尝试，从中体验细微的变化，渐渐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剪辑点，那种充裕感在拍摄现场是不可能有的。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检查不同的镜次，改变节奏，删除台词，从一个演员的视点转移到另一个演员的视点。就像王尔德形容的，他“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去掉一个逗号，下午又把它放了回去。”但这对王尔德行得通，对帕库拉也行得通。影片就这样好看起来。

帕库拉剪片时让我在身边协助，因为看中了我的分析能力。我要把胶片和声音磁道拼在一起，添加小片段，将其移来移去，这都是耗时的工作。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我们聘请了第二位剪辑师卢·隆巴尔多，他也是佩金帕训练出来的剪辑师。帕库拉在两位剪辑师之间来回穿梭，我则在他身边随时待命。这段时间里，我亲眼看到表演显得更出色了，感觉到节奏改善后每场戏的情感也释放出来了。这是受益终身的电影教育（我做得还不错，所以后来帕库拉导演了一部我编剧的电影，他又让我和他共同度过了剪辑室的日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电影逐渐向我们展示出它的主题，约翰·休斯顿曾把一部电影的主题比作钟声，《总统班底》做到了他所说的“每场戏中都有钟声响起”。这部电影的主题不单是“记者需要了解真相”，更是“人们需要坦白”。最关键的是受访者，在每一次中采访激发观众共鸣的情感内核是受访者的内心斗争。他们为什么坦白？为什么说出真相？而他们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记者和受访者都是理智的人，按理说不会像我们的角色那样冒险。他们的内心驱动力超越了逻辑，双方其实有着同样的冲动，他们的冲动彼此激发，像共舞一曲亲密的探戈。我们无法解释他们的动机，就像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跳探戈，但我们可以感受他们的心情，这种无法形容的内在心理驱动着每场戏——如果这个故事可以用语言来解释，你就不必看这部电影。这才是画面的真正力量，也是这部电影鼓舞了一代调查记者的真正原因。

我们为《总统班底》辛苦了三个月。雷德福为了这部电影停下了其他项目，并充分信任帕库拉，放手让他创作。雷德福也会不时参与，提供新鲜的视角。制片人科布伦兹正在为全国影院业主协会准备推广样片的放映活动。观看者都是可能会预订这部电影的人，他们这些保守的人，也将是第一批看到这部影片的观众。他们的反应将决定公众对这部影片的期待，我们知道人们对这部影片有很多疑问，它会不会又像《了不起的盖茨比》（1974）那样虚张声势？我们也担心：影院老板们会想预订这部电影吗？

在给全国影院业主协会放映前一周，科布伦茨为帕库拉和雷德福放映了他制作的样片版本。我没有被邀请。帕库拉和雷德福看完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原因是科布伦茨担心故事会是静止的、单调乏味的，于是，他为了追求时髦和活力，把推广样片剪成了一个疯狂的拼贴，主人公在里面不停挥舞着电话和纸张，跑来跑去。他这么剪，恰恰在告诉别人这部电影很无聊。雷德福和帕库拉陷入了困境，不放样片有很大的风险，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隐藏什么东西，并且会影响预订，引发流言蜚语。但雷德福认为放了这个版本会更糟，帕库拉也同意。

我亲历了这部电影的诞生，了解每一寸素材，了解驱动这部电影的力量。我请帕库拉给我一个周末，让我和助理剪辑师蒂姆·奥米阿拉一起剪一个新版本。我们把片中的几个关键时刻放在一起，从弗兰克·威尔斯发现泄密的胶带开始，逐步推进到连任委员会诚实正直的财务主管对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说出真相的那个夜晚，虽然他没有亲口说出尼克松的头号幕僚霍尔德里曼是幕后黑手。我们仅用几场戏就表现出了记者与受访者之间拉锯的张力——记者对真相的渴求和受访者坦白的迫切冲动。我是为了帕库拉剪这个样片，而奥米阿拉是为了雷德福。

我本该躲着雷德福的，这是因为帕库拉和雷德福两人划定了严格的边界。我是帕库拉的人，因此雷德福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可是拍摄过程中，我总得在新闻编辑室片场，只好尽量躲开他的视线。这个推广样片是我和雷德福第一次真正发生联系。他很喜欢我们这个版本——我理解了他的电影，并将其浓缩成了一种充满可能性的东西。显然，在片场默默努力没有白费。重要的是，雷德福终于松了口气。

气，他把推广样片寄了出去。那个周末，我为整部影片所做的一切都值了。雷德福说要看看我的《科博馆》。我为他放了一场，那是一部 35 毫米的、半埃默斯式蒙太奇半真实电影风格的纪录片。他说了一些夸奖的话。放映结束后，我卖给他一个登山题材的项目，由我在哥伦比亚公司制作。

戈德曼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整个电影行业，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什么一定行得通。”我记得《总统班底》只预映了一次，不在加州。一开始观众不知道要放什么样的电影，出片名时大家一片沉默，还爆出几声零星的嘘声。接着又是一阵安静。有几个人低声抱怨说这是诽谤，离场而去。又安静了。我被这个故事的抽象程度深深打动，敌人只是名字，他们的罪行是写支票。我们的主人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个人利害。我靠向帕库拉，说：“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电影。”“我知道，”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这场放映迎来了第一个光明的时刻，全场观众都笑了起来。这意味着刚才的沉默是因为他们沉浸在其中。就这样，我们征服了观众。

电影结束后，我和帕库拉就分开了。在《总统班底》的剪辑过程中，我的《科博馆》获得了奥斯卡提名，我成为了学院成员，成为当时学院院长格里高里·派克的青年运动的一部分。当《总统班底》获得八项奥斯卡提名时，我申请了颁奖典礼的门票。由于雷德福最终给我挂了协同制片人的头衔，学院安排我和妻子坐在《总统班底》团队的第四排中心的位置，离艾伦·帕库拉只有三个座位。他被提名为最佳导演，我俯身祝他好运，他吓了一跳：“你在这里干什么？”

约翰·阿维德森赢了最佳导演，帮他拿下奥斯卡的是《洛奇》。 🍷

[【返回目录】](#)

本·布莱德利：水门事件之后

[**本杰明·布莱德利** Benjamin C. Bradlee, 1921.8.26 - 2014.10.21, 美国著名报人，于 1968 年至 1991 年间担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将《华盛顿邮报》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他的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监督了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该报道最终导致总统尼克松下台。本文摘自其自传《最危险的总编辑》(A Good Life) 一书，翻译：蒋旭峰、王珊珊，内容有所删减，标题为原编者所加，首发于微信公号：《东方历史评论》ohistory]



本杰明·布莱德利

我的私人生活

我经常在编辑室串门，而且已经把这功夫练到出神入化了，我就经常在各个编辑室之间到处闲逛，听人说话，说说闲话，鼓励编辑和记者，询问记者他们要报道对象的真实面目。到处串门是我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光，也可能甚至是我的工作中的最好部分。“品位”专栏可不是个适合闲逛的地方。记者们都很有个性，藐视权威，对邮报和他们自己的力量都没有太多信心。萨利·昆恩和菲尔·凯西两人坐对桌，这儿可是我闲逛的好场所。萨利·昆恩更漂亮，但是菲尔·凯西更有意思。尽管萨利坚持一直管我叫“布莱得利先生”，但是在萨利 1973 年辞职离开《华盛顿邮报》前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我一直觉得和她们两人谈话十分有趣，也经常找她们闲聊。

我和萨利的初识，得益于菲尔·格耶林的介绍。在菲尔面试她，看她适不适合社论版的编辑秘书一职时，将她介绍给了我。我建议他不要录取她，不只是因为她不会速记。对我自己而言，我向菲尔建议说引进任何一个这么有吸引力的人来工作，日后多少都会带来麻烦。

但是差不多一个月后，《华盛顿邮报》急于找到一个人能采访华盛顿的名流聚会，这些聚会堪称精英云集。这时，萨利·昆恩的名字再一次被人提到。她看起来就是这份工作的绝佳人选，只有一点缺憾之处，就是她平生还没写过一篇采访稿。她在陆军初出茅庐时，还只是个在阿尔及利亚大使彻里夫·加莱尔的社交秘书。她参加了鲍比·肯尼迪 1968 年的竞选，所以她几乎认识华盛顿的每个人。当她表现得缺少经验时，别人记得当时我说：“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其实，当我和菲尔·格耶林谈到这一次想雇佣她时，“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这话其实是菲尔说的。

不管怎么说，萨利·昆恩拿到了这份工作，没多久就搞到了自己独家的、时尚的、不敬的内部资料，受访者提供了翔实材料，而她将它们整理成文。“品位”专栏在汤姆·肯德里克和谢尔比·科菲的先后主持下，逐渐成为了无与伦比的新一代记者精英云集的地方。B·J·菲利普斯、米亚尔·麦克博生和尼克·冯·霍夫曼就是其中的翘楚，他们富有活力，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说话幽默风趣。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并富有才华地将自己的思想展现在所有人眼前。

萨利写了些昙花一现般名人的资料，也写了些华盛顿大小机构里的特殊故事。她富有智慧，文章中语带不敬，总能搞到内部资料。她有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能力，让人觉得不吐不快。亨利·基辛格有一次曾说，当马克辛·柴舍尔写了关于他的故事之后，他真想杀了她；但是当萨利写了他的故事之后，他觉得自己想自杀。

她的文章一篇比一篇写得好，能力也越来越得到肯定，可以说成了报社里一颗最为璀璨的新星。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直到 1973 年 6 月 23 日，她宣布自己要离开《华盛顿邮报》去投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她会加入修格斯·拉德主办的节目，那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档同“今日报道”的芭芭拉·沃尔特斯打擂的有趣节目。我一直极力吸引富有才智的年轻人加入《华盛顿邮报》，我自然不愿意看到那些富有才智的年轻人离开报社去投奔他方。于是，我就问她我能不能请她吃午饭，顺便说服她留下。她同意了，但是那时她还管我叫布莱得利先生。

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那顿午饭都不轻松。我还没开始游说她，她就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她要离开《华盛顿邮报》……她就是那些匿名信的始作俑者（前文中提到作者收到一些浪漫的匿名信），而且她还爱着我。这让我有些吃惊，却仍然深感荣幸，觉得我心田最柔软的部分仿佛被她征服了。我禁不住想起汤尼，记者的工作在她眼中大都非常浅薄，相对于把工夫花在报道那些突发性大规模事件上，她更乐于将时间投入到那些内涵丰富而美好的故事创作中。她对自己的社会工作非常在乎。我也曾惦记着同她重拾往日情怀，但现在我的希望已经彻底幻灭了。但在这以前，我也从未想过会同萨利共堕爱河。

我颇花了点心思想要说服她，但还是无果而终。第二天，她就动身前往纽约了。

但是她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新闻”主持人和休斯·拉德共同播报这一节目，打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她本身缺乏经验，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给她机会来积累这类经验，而马上却要她来担当这一需要很多经验的工作岗位。我听到的说法很简单：女性朋友们不是想要看到个女主播吗？好的，我们这儿就有一位了，大家来看看她干得怎么样吧。我眼中的休斯·拉德仪表堂堂，他有些固执、幽默，见解独到。而他和萨利配合也很默契。萨利一开头起步时是有些艰难，她第一天播报时高烧 40°，但在我看来，她的表现不错完全可以留观后效。几个月后，节目表现的好坏水落石出，他们的评分是 1.6，平均收视率为 14%。二十多年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新闻”改名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早报道”，但它的收视率仍然是电视网里所有早间节目中的倒数第一名。

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我正不得不面对人生中的又一次艰难抉择。我可以仍然留在我曾经深爱的汤尼身边，努力与她重燃爱火，她已经为我生了两个孩子。而我眼前还有另一条道路，首先我要承认自己又一次堕入爱河，而这将意味着我要和萨利开始一段全新不同的生活。这段生活中必然充满了刺激，让我俩都充满激情，我们也将一起为取得的成果而欢欣鼓舞。我意识到，这次抉择和十九年前在法国时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意识到有些人会为此难过，但我又能怎么做呢？汤尼曾说过，要是我没有提前两年从越南和日本回来就好了，但这不意味她现在想要我离开。



本杰明·布莱德利

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搬到旅馆去住上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又在水门街区找了间公寓。1973 年 10 月萨利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之后，她也搬到了那里住。她决定结束自己命途多舛的电视新闻主持人的工作，写了一本名叫《教你做明星》的书，还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找到了份工作。我觉得萨利的这个决定简直太差劲了，死水一潭的《纽约时报》无法让她大展拳脚。而且，我也害怕在竞争对手的报纸上看到萨利尖刻的评论和资料，尤其是在这种竞争中。

我对《纽约时报》的评论一点也不为过。当他们的执行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雇用萨利时，萨利就告诉他说，自己已经答应为《华盛顿邮报》写最后一篇自由撰稿人文章，文章主要描述的是华盛顿最富有争议性的贵妇艾丽思·罗斯福·朗沃思夫人。丹尼尔同意了，但是这篇报道刚一出炉，他又把萨利叫过来说：“我们《纽约时报》的人都大吃一惊。”他还告诉她说，他们都对她会这么缺乏敏感性的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任务而感到震惊。那恐怕还是他和萨利之间最为开诚布公的一次讲话了。这篇报道于周二见报，大家都知道，《纽约时报》根本不适合去发表这样的文章，因为那文章太长而且太有趣了。这位夫人谈到了不少关于女同性恋的话题，并用“那些亲爱的老男人的家伙”来暗指阴茎……这篇报道成了那几天之中人们街谈巷论惟一的焦点。

接下来的就是解决女朋友的问题了。我告诉霍华德·西蒙斯，这个问题必须由我自己来解决，但要是他和“品位”专栏的编辑谢尔比·科菲想要雇用她的话，我肯定会请他们吃饭。于是，周二下午，西蒙斯把萨利叫进来说，她为《纽约时报》工作实在是太荒谬了，想让她官复原职，而萨利也接受了这个职务。这就把女朋友的问题解决了，尽管华盛顿所有的报纸都把她说成是“布莱得利现任女友”，特别是《华盛顿星报》的闲话专栏“耳闻”。

那是1973年的秋天，对我们这一代最为重要的新闻事件——水门事件的调查正在如火如荼的进展当中。我52岁了，是三个孩子的爹：25岁的本，快要15岁的迪诺，快要13岁的玛丽娜。萨利比我年轻二十岁，刚结束同一位纽约报人的长期恋爱，从来没结过婚。我又要再一次忍受无法言喻的痛苦，向我的儿女们解释我的新恋情。我不知从哪里读到，要想缓解这种情况下子女的愤怒，就是鼓励这种愤怒的情绪，将自己暴露在他们的狂风暴雨之下。我就是这么做的。最愤怒的是迪诺，至少他的愤怒声是最响亮的。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们，他当时在地下室的一间车间里，制作高质量的皮具钱包、手提箱和皮夹。他几乎在沉默中又锤又切，磨平上油，而我在旁边解释我们会有怎样的快乐，会享受到多么奇妙的幸福，而要是放弃这样的快乐的话，会有多么的悲哀。

迪诺和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解决这件事，他是那么难受，但是我想后来他也对我非常理解。玛丽娜从一开始就装成很理解。但她和萨利的友情（我是指真实的友谊）是后来才出现的，不过她们之间毕竟终于培养出了友谊。而汤尼和我，过了五年才重新成为朋友。五年后，她心情才变得不再沉郁，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分手，她的责任和我一样大。

但是早在这一切之前，我和萨利就过上了让人兴奋的生活。水门事件解决了。尼克松离职了。我对未来也有了几分隐忧。

从萨利·昆恩不再管我叫“布莱得利先生”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活中便充满了无尽的欢乐。在她的身边充满了刺激和乐趣，让人有种清新活泼的感觉，想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好好打拼，想和她一起充分享受并且共同分享。她觉得我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到《华盛顿邮报》中去是自然而然的，也是让人高兴的。当她回到《华盛顿邮报》后，她将自己超凡的才智都投入了“品位”专栏中，满怀自信和

品味地踏入这片等待开拓的土地。

我们一起住在水门大楼 14 层的公寓里，从房间里就能眺望到波托马克河。我觉得，我们的选址在某个方面来看是正确的决定。然后，萨利觉得与其住在我家，还不如我俩一起搬到她家去住。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刺耳之处，甚至很合适。从她身上我不仅发现了女性的温柔，也发现了女权主义者的果敢，这种做派让我很是喜欢。萨利用出书挣的钱在第 21 大街杜邦圆环外买了栋房子，在这一带，我的朋友兼同事拉里·斯特恩可是龙头老大。

萨利和我静悄悄地开始了我们充满探索和兴奋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也息息相关。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谈及婚姻，因此也不急于谈离婚的问题。萨利在这上面颇有女权主义者的风范，她说她和我之间的感情才不靠一张纸来维系呢。但是有关婚姻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我们一开始触及这问题时还很小心，但是越来越坚持。在内心深处，我对萨利·昆恩和我们在一起的生活都着了魔似的。

《与肯尼迪交谈》

1974 年 11 月，肯尼迪过世 11 年后，我发表了自己对肯尼迪的评论。在《与肯尼迪交谈》前言的最后一段，我写到：

在他短暂的执政生涯里，我觉得他的承诺和带给我们的希望比他所做到的一切更重要。但是他为美国而坚持的承诺和希望是真实的，而自肯尼迪过世之后，美国却没有向实现希望和承诺的方面前进一步。

我仍然相信这一点。但是他去世三十年后，不断出现的新证据和新材料，人们对他的几十项的新评价和赞赏让我更相信这一点。

有人说，肯尼迪到处沾花惹草、韵事不少。这很有趣，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本来对他一生中的这个倾向毫无了解的人，或只是略有耳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这并不一定降低我们对他品质的看法。

肯尼迪的信念其实没有我所想得那么坚定。就像理查德·里夫斯所说的那样，肯尼迪“没有受多少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多少感情。他真实拥有的信念……他经常愿意拖一拖再说，……特别是这样可能避免冲突的话……或是避免被称为软弱的危险。”

肯尼迪将自己的人生划分成不同的部分，这比我想象得要多。没有一位他的朋友或是传记作家能完全认清他生活中的全部方面。

关于肯尼迪一生的真相，就和其他所有的真相一样，都要慢慢地才会浮出水面。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发现更多的真相，前一位研究者发现的真相也会比后一位多。我怀疑这种情况会不会继续。但是的确一直如此。

在编辑《与肯尼迪交谈》一书的最后阶段，杰奎琳给我打了个电话，这是我目睹鲍比·肯尼迪的尸体被火车运回阿灵顿公墓后第一次和她交谈。她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给她看看这本书，她还提到她听

说我已经把书稿拿给乔·克雷福特和其他人看过了。我告诉她说我想等书成形了再给她，一周后我就这么做了。一周后，她打电话回来时明显表示出她自己不喜欢这本书。“这本书说你自己比说总统要多。”她这样说。而且她也不喜欢里面的那些粗话。她觉得她的孩子们可能会觉得受到了冒犯。我不确定那些是否真的就是她不喜欢那本书的全部理由了。

她的批评让我很受伤害，也十分为难。批评家们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很有趣，但是书中对肯尼迪的评价恐怕太高了，而对他的批评则明显不够。我不想写一本评议是非的传记。我只是想告诉世人，当总统和夫人在放松的状态下，他们会是怎样的。一位我钦佩的人曾经说，他希望林肯会有朋友为他写一本这样的传记。

在这次交谈后，我见过杰奎琳两次。在 1976 年纽约民主党大会期间，我和萨利刚到亚瑟·斯盖利辛格举办的一场晚会时，她正要离开。我低声告诉萨利，杰奎琳正沿街走过来，我伸出了手，说道：“好啊，杰奎琳。”她一言不发，和我们擦肩而过。过了一段时间，杰奎琳和她两个孩子又住进了我们在圣马丁岛萨曼娜海滩上简易小屋的隔壁。在海滩的一周时间里，我们仿佛经常对视，但是从来没有撞上过。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们正要离开简易浴室去饭店吃晚餐时，我们才差点“遭遇”。她在离我只有不到半米的地方，两眼直视前方，一言不发，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拍摄水门事件

尼克松总统辞职后没多久的一天，伍德沃德悄悄跑到我办公室，跟我说“鲍勃·瑞德福德在华盛顿。”还问我想不想见他。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电影《总统班底》的拍摄工作正在“进展”中。瑞德福德是个富有魅力而颇有专业精神的人，在我们的第一次交谈中，他就占尽了先机：他很清楚要拍电影的人是他而不是我。而他想要的东西，把我们吓了一跳。首先，他想把片中的报纸直接称为《华盛顿邮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想拍成一部什么电影，更不知道这个故事会是怎样的（没有剧本、导演人选和演员名单），我们因此拒绝了合作。最后，他想要在编辑室里拍摄，并保证“只”在凌晨 4 点到 9 点这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拍摄，他的理由是在这段时间里对一家日报来说，并不算繁忙。我们回答说：“这根本是在做梦。”

我们不让他们进入编辑室，但是在剩下的两点上，我们都做出了让步。我们向乔·卡利法诺咨询，瑞德福德能不能合法使用《华盛顿邮报》这一名字。而这个家伙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他居然告诉我们瑞德福德可以合法使用他想要的任何名字，这真是让我们大出所料。我们私下里认为，这家伙肯定是在电影里弄个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我们告诉瑞德福德我们的想法时，他也只是说他的律师和卡利法诺意见一致。

我们开始了奇妙的冒险旅途，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演员们扮演着真实的人物，从小说的虚构视角来一窥真实的世界。我学到的东西远远不足以帮助我应付这些危机。显然，让自己的名声至于如

此危险的境地中，我们谁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当伍德沃德告诉我们，瑞德福德准备让导演了《花街杀人王》和《谁杀死了知更鸟？》的名导演艾伦·帕库拉来执导这部电影时，我们说：“这可有意思啊，他怎么会拍有关理查德·尼克松和编辑室里的那些大老爷们的片子。”

我们错了。

艾伦·帕库拉不过是伪装成假导演罢了。他后来就出演了弗洛伊德。要不是他有点红色的胡子，他看上去真的同弗洛伊德如出一辙，他温柔地倾听，分析拍摄的场景，懂得从周围的环境中去平静地吸收知识，体会人们的表情，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唇上总是浮现出嘲弄的微笑。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意见丝毫不会影响到片子的拍摄进程后，我们干脆决定，只要在不影响我们第二天发行报纸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倾力相助。瑞德福德想要帕库拉在《华盛顿邮报》呆上“一段时间”，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一段时间”其实指的是一个月左右，尽管没多久他就开始去忙着美工方面的工作了。他要求在我身边呆上三天，听我和别人的电话交谈，参加新闻会议，同编辑和记者交谈等。他坐在沙发上后，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他的存在，毕竟我是真正做主的那个人。他倒是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对我的父母、哥哥妹妹等人，他也连带着有了更多的认识。我甚至觉得他比我看的那五个心理医生对我的了解都要多。他也花了一些时间，弄清楚了与水门事件及《华盛顿邮报》有关人物的职务。《华盛顿邮报》中那些和水门事件没有关系的人，怀着复杂的情感关注着整个片子的摄制过程。他们在看见那些大牌明星时也同样激动，但是却因为不能亲身参与其中而深感遗憾。

瑞德福德在华府内外奔走，大家发现《华盛顿邮报》办公楼里的那帮狂热的追星族们总是会把瑞德福德的访问搅得一团乱，但这主要是伍德沃德个人的责任。达斯丁·霍夫曼到编辑室里呆了两周左右的时间，他先是学习记者应该如何行事，然后又学习伯恩斯坦是如何行事的。他已经对伯恩斯坦很了解了，他能够变成伯恩斯坦，甚至模仿他说话，有时连伍德沃德都会被捉弄。

有一次，我们正要一起去什么地方吃中饭，警方的广播里说有个人想从离《华盛顿邮报》大楼不远的一座建筑的十五楼上跳下去。我就带着霍夫曼一起去看，想让他知道那些八卦小报是如何报道的。

（跳楼者往下俯视。人群聚集。人们一起喊，“快跳吧。”那个人可能会跳，当然也可能不跳。）事件正一幕幕在我们面前展开，就正如上面的描述一样，但忽然人们认出了霍夫曼。然后，大家的注意力忽然一下子从跳楼的那个人身上，转到了年纪轻轻就窜红的这个明星身上。那个要跳楼的人就被遗忘了。（他并没有跳。）

这真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刚好可以用来证明媒体在海森伯格原则上有着不同看法。这条原则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德国的一位物理学家，因为他发现，对次原子行为的测量、甚至是观察，就能够改变次原子本身的结构。达斯丁·霍夫曼的到场将这次事件变成了一场盛观。读者（特别是电视观众）在理解一个新闻事件前，一定要弄清海森伯格原则的真谛。媒体里描述的那件事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在

美国最精锐部队控制下的索马里真的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吗？还是那些昏头昏脑的美国大兵只是被那些等候了几个小时的自由专栏作者给逮到了呢？有些差别经常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瑞德福德在加利福尼亚伯班克的摄影棚里，以惊人的一致性重建了《华盛顿邮报》的编辑部。我曾经答应那时 14 岁的玛丽娜，她要是能考到一定好成绩的话，我就让她和瑞德福德共进烛光晚餐。其实，那时我既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这件事，也知道理论上来说，玛丽娜考不到那个分数。但是她居然破天荒考到了。一天早上我们一起走进拍摄地点，我惊呆了。那里的桌子和我们在报社用的是一样的，颜色一样，设计也完全一样。桌上也铺着同样的桌布，这其实是从在华盛顿的邮报报社桌子上抽下来，运到加利福尼亚州区的。聪明的汉纳·帕库拉帮了我个忙，说服了瑞德福德同艾伦、玛丽娜以及我和她共进烛光晚餐。

当电影摄制完成后，瑞德福德邀请了我们一帮人，凯瑟琳、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我以及西蒙斯和罗森菲尔德大概总共十个人参加特别放映会。我们每个人都单独坐着，担心会有什么反应或被发现有什么反应。放映结束后，大家都什么不说，直到最后瑞德福德请求我们说，“看在上帝的面子上，谁说点什么吧？”我们大多数人都喃喃地表示大致赞成。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电影真得不错。我觉得演员很棒，我觉得导演很棒。我很惊讶，自己当时没有意识到这部电影会留下什么样的阴影。比如说吧，我没有想到，我们所有的后代在看完这部 147 分钟长的电影后，会对水门事件有什么样的认识。



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左）和**鲍勃·伍德沃德**（右）

《总统班底》一书巩固了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明星地位。他们没花多大工夫就拿到了普利策奖，出了书，拍了电影，又开始写本新书《最后的日子》。卡尔第一次手里头有了点钱，可他花钱的速度同挣钱一样快，他纵情于任何名流聚集的场所。而鲍勃则买了栋房子，剩下的每一个铜板都拿去做投资。卡尔喜欢半夜流连声色犬马场所，鲍勃则喜欢开夜车干活。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还在续写他们的奇迹，但是新生记者们已经纷纷涌现出来，只是想要寻找到同样的成名机会，想去效仿他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同样的坚毅精神。我们拿那个目光如炬、头发蓬乱的伍德斯坦开玩笑，说他刚刚采访了乔治王子县的火灾回来，报告说消防队队长是个反犹分子，消防水管里有汽油，而有人发现一个看上去像霍华德·亨特的人溜进了树林里。我的有些负责报纸运营方面的同事发表了意见，说需要约束那些头脑发热的年轻人，免得他们以后惹祸。现在想来，我们那时对麻烦顾虑过多，而在新闻报道方面注意不够。

年轻人的世界

毋庸置疑的是，水门事件的传奇报道使得一批聪明、年轻、有动力、有才华的年轻人进入了新闻界，而不是流向其他行业。华盛顿新闻学院教导主任史考蒂·莱斯顿发表了关于这个时代的一篇演讲，催促新闻界不要放松他们调查的压力，不要担心公众对是否会再有一次水门事件而心存猜疑，也不要考虑有些编辑听信了无中生有的抱怨，说是新闻界积累了太多的力量。莱斯顿说，事实情况正相反，现在正是运用这种力量将新闻界的声音发扬光大的时候。新闻界要关注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水门事件证明他们不是按规矩办事的。莱斯顿是对的，但是他的很多同事对他的评论不屑一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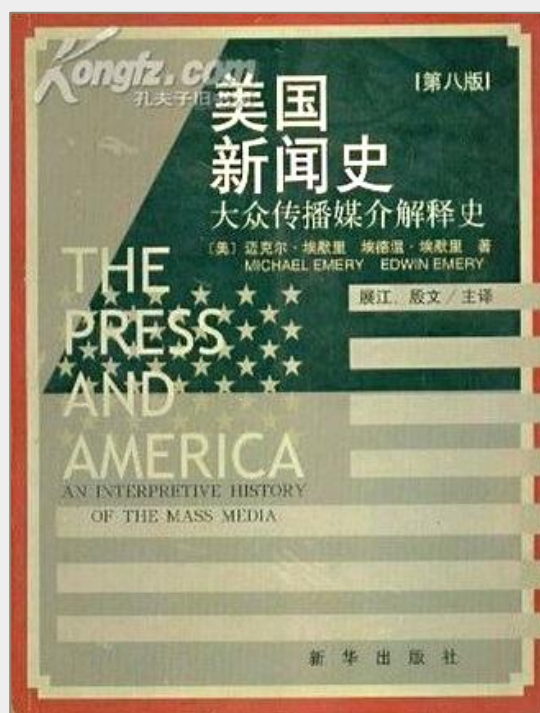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样，既不是年轻记者急于发掘丑闻的潮流，也不是丑闻自身使得水门事件后的新闻界变得与过往不同。但是新闻业绝大多数记者相信的一个推测一直没有改变：水门事件之后，只要有官员遇到让人难堪的事件时，出于本能大致上都会撒谎。以前是“追着女人的裙边走”或是“嗅着铜臭味找新闻”，现在记者们开始想要“戳穿谎言”，并以此为新的行为准则。 🍷

[【返回目录】](#)

资中筠：实现舆论监督的奋斗史

[**资中筠** 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本文首发于 2001 年，转载自作者博客，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在美国，新闻媒体已被公认为可与“三权”并列的“第四权”。笔者在论述美国 20 世纪的渐进的改良时，曾把社会批判运动列为这种改良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其中报刊媒体又是社会批判的主要载体。如今喜读《美国新闻史》第八版的中译本，使我有更深一步的启发。



《美国新闻史》第八版

[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 著，展江、殷文 等译
新华出版社 2001 年 9 月出版

美国从殖民时代以来的新闻发展史充分证实了拙著《冷眼向洋》中的一段话：

“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这与某些意见只许‘内部’说，说给皇帝一个人听，或只共决策者参考，听不听在他，有本质的区别。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毛孔中都带着血污，那么，言论自由就是其净化剂。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一源于欧洲的传统自 19 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批判形成一种拉力，使美国不至于滑向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冷眼向洋》，三联书店 2000/2001,上册第 14 页）。

印什么，给谁看

新闻业的出现源于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所以早期的办报人多为印刷商。造纸和印刷都是国人最引以自豪的对世界的贡献，书中也提到活字板印刷是马哥波罗传到欧洲去的（尽管此说不一定可靠）。但是新闻报纸的发展，中国却大大落后。显然，印刷术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足条件，更重要的是印什么，给谁看。以公众阅读为对象的新闻报刊与公众参与的需要是分不开的。

早期欧洲报业曲折的发展史正是与反对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进程同步。权力集中的专制王朝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出版和公众舆论严加控制。王室的原则是：要确保“安定”就必须对异见人士进行镇压。

从 1534 年英国亨利八世首创“许可证”制，即印刷商在开张营业前必须先获得皇家的许可，到 1702 年出现了第一张具有现代报纸要素的英文报纸《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中间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争、宗教革命、贵族造反、王权削弱，政治分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兴起，出现公民社会，经过许多先进人士的呐喊和不屈不挠的努力，包括许多报业人士因“煽动罪”而坐牢，新闻报刊得以在日益扩大的夹缝中冲破障碍，发展壮大。其间诗人密尔顿的“论新闻自由”成为新闻史上的不朽篇章。《美国新闻史》的作者关于这段历史作了精辟的总结：

“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史告诉人们：新闻出版事业是属于统治者的。假如权力集中于一个君主或者一个精英集团之手，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就根本没有必要去了解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信息和观点。的确，提供消息（新闻）给公众，事实上会酿成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因而在这种制度下，新闻报道必须严格限于消遣娱乐，或是不痛不痒的评论。另一方面，如果公众参与政治，那么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相称的信息。从这段历史中还可吸取另一条教训，那就是：一个政府越是巩固，它就越不怕别人挖它的墙脚，它给予新闻报道的自由就越多。直到目前为止，情况依然如此”。（第 18-19 页）。

不自由，毋宁死

人们有理由认为，既然在英国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那么，对那些为争取信仰自由而到北美大陆的殖民者说来，新闻自由理应不成问题。事实却不然。从 17 世纪后半的殖民时代到美国独立之后的一百年间，新大陆的出版和新闻业不断受到权力的干涉和压制。因为，“新闻自由的基石之一是自由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第 85 页），而对于在位者，运用手中的权力予以压制是很难抵挡的诱惑。当然，与王权专制政府不同，还得有法律依据。在早期的美国，政府运用的武器还是来自英国的“煽动罪”和“毁谤罪”。因此，美国现代新闻报刊也是在与政府干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而且同法律的完善过程相一致。

在反抗英国争取独立过程中，革命的舆论应运而生，出现了一批报纸和小册子，以自由的名义宣

扬独立的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是潘恩撰写的《危机》和《常识》。独立之后，那些高呼“不自由，无宁死”的开国元勋们成为执政者。他们如何对待反对自己的舆论，关系到美国向何处去的选择：是继续进行社会变革，把那些战斗口号付诸实施，还是把财产权作为最根本的考虑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美国的宪法是二者妥协的产物。但是紧接着保守派作出的一个重要让步——《权利法案》（即第一修正案）的通过——至关重要，因为它保障了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它，就没有以后如此发达的新闻业。

尽管如此，在实践中还是经过曲折斗争的。以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人与民主派杰斐逊对待新闻自由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种理念。联邦党人控制的政府于 1798 年通过《外侨法》和《煽动法》，以此来限制对他们的批评言论。这一政策遭到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派的抨击。杰斐逊的名言是：“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第 91 页）。



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美国第三任总统

轮到杰斐逊当选为总统之后，他对待反对政府的舆论是否“叶公好龙”，才是对民主理想的真正考验。须知那时的反对言论并非温文尔雅的说理，而是包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谩骂乃至人身攻击，并且对公众是有影响的。这种攻击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总的说来，他还是忍了下来，坚持“保护他们撒谎和毁谤的权利”作为对民众判断力的信心的考验，“看一看不借助强制，光凭自由讨论，是否不足以宣传和保护真理，是否不足以使政府在行动和观点方面保持纯洁和正直”。当然，百分之

百做到这一点也不大可能。特别是过去的法律还没有废除，在忍无可忍时，杰斐逊也曾援用有关法律把一名记者以“诽谤罪”告到法庭，并且胜诉。有意思的是，为这名记者辩护的律师却是汉密尔顿。尽管最后败诉，但汉密尔顿在辩护中提出的原则：报界“有权利本着善良的动机，为了正当的目的，发表事实真相而不受惩罚”，几年以后成为法律，确立了“只有事实真相才可以用于诽谤诉讼辩护”的原则。

1812年最高法院宣布联邦政府不得依据旧的法律对新闻界提出起诉，至此，英国习惯法中关于“煽动性毁谤”的影响完全退出了美国。这是向前进了一大步，把政府与私人放在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此新闻界对政府以及上至总统的任何政要的揭露、批判，和对任何平民百姓一样，只看是否属实，不存在“煽动”或危害社会的问题。

南北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林肯总统也面临类似的考验：主要问题一是对战事的报道是否实行检查；二是如何对待一切有利于“敌方”（特别是分离主义）的言论。那时新闻业已很发达，在国内政见分歧极为尖锐的情况下，报界对林肯及北方军的攻击十分激烈。就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尽管北方获胜，舆论并不利于林肯一方。在军队坚持下，内战期间是实行了新闻检查，不过林肯还是坚持了他对言论自由的信仰，多次取消对被军队处罚的报纸的禁令。

事实上，南北战争中对战地记者的限制是所有战争中最少的，划定的唯一界限是不向敌人泄露正在进行的作战部署的机密。事实证明，记者基本上能够自律，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而许多载诸史册的优秀战地报道由此脱颖而出。书中没有提到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时，约翰逊总统又面临同样的抉择：对于强大的反越战的媒体攻势和群众运动是否加以压制。那时可以动用的是《危害国家安全法》，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据他后来自己说，不是没有人建议过，但是他对麦卡锡主义记忆犹新，不愿出现那种歇斯底里气氛。所以，前线一边打仗，而国内反战的言论还照样公开发表。

促公正，开民智

美国一直是两党制，社会思潮也在偏右的保守派与偏左的自由派之间摇摆，新闻界自然也反映各种不同的派别取向，早期的报刊政党色彩更加鲜明。不过总的说来新闻界的主流率多为自由派，宣扬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自有新闻工作以来就有社会改革精神。“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当需要唤起公众舆论来保证经济、政治的进步和一种更公正的社会模式时，新闻和文学起到了它们的作用，并从中产生了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例如独立前的呐喊、最早的废奴主义言论和长期对种族歧视的揭露和抨击、20世纪初期的“扒粪”新闻和文学、60年代的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中的“五角大楼文件”的揭露以及两名新闻记者顶着各种压力锲而不舍，把他们认为破坏了基本民主规程的尼克松总统拉下马，等等。

其中特别是20世纪初期，新闻界同文学家、政治家、劳工领袖、改革家鼓动家、教授、牧师以及

社会慈善工作者一道，对“净化”日益走向腐败的美国政治和制止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进步主义”时期，新闻工作者获得了“人民斗士”的美誉。



美国第 37 任总统**尼克松**，被美国新闻媒体揭露其玩弄政治权力的丑闻，既著名的“水门事件”，于 1972 年下台

除此之外，新闻业的发达对普及（广义的）教育、开启民智起着重要的作用。欧洲人认为美国能如此迅速地在全国范围提高启蒙水平是有魔法相助，这一“魔法”就是印行报纸。报界的力量并不在于以意见劝服他人，而在于传播信息以及唤起人们对或深刻或肤浅的问题的兴趣。美国早期拓荒者经常处于远离文明的边远地区，他们每到一处首先建立的一是教堂、二是学校、三是邮局。报纸就是通过邮局送到每一个拓荒者手中的，而且价格低廉，使穷人都读得起。今天，印刷品的邮费低于信件已成惯例，殊不知它的创始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任邮局总长时制定一项政策：报纸编辑可以在邮局免费交换各自的报纸，报纸的邮费低于成本，并使邮局定期为报刊服务。这样，分散的人群可以互通消息，这是在美国立国初期把分散而脆弱的民族团结起来的几乎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商业化，致堕落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美国的新闻媒体一贯坚持真理、主持公道，那也不符合事实。反面的因素有多种，就对抗权势而言，固然有法律的保障，但是无形的社会压力和个人或报纸的利害的考虑总是存在。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使多少人由于恐惧而不敢自由地发表言论；或者在利诱之下，转而与本应反抗的对象合作，这两种情况时起时落，只是在多数情况下是无形的。不过，促使媒体堕落的最大的内在拉力还是商业化因素。北美大陆的报纸从一开始就是为传播和交流商品信息而出现的，也就是后来

的广告。在它的发展和普及过程中从未离开过广告商的支持。这与发行量当然相辅相成。争取读者有两种取向，一是靠提供鲜为人知的与大众利益攸关的事实真相，并作为公众的喉舌发表犀利的社论和评论；一是迎合低俗的趣味，靠暴力、煽情、揭人隐私以及言过其实的商业广告，所谓“黄色新闻”由此而来（这里“黄色”不一定是色情，但包括色情），后来发展到追星的“狗仔队”等等。

从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开始平民化时，后一种倾向就日益发展。不过有时与前者合二而一，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扒粪”新闻一方面出于主持正义，同时也迎合小市民对富人政要的秘闻隐私的兴趣。只要是符合事实的，都无可厚非。当然，美国新闻界也存在对黄色新闻的批判，称这类报馆为“把青年训练成永远遭人唾骂的人”的“地狱”。《纽约时报》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异军突起，开辟了另一种模式：不靠煽情、噱头迎合大众，而要用一种简明动人的方式，“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并且使报纸的各栏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目前一些全国性的严肃的大报和一些摒弃广告的纯新闻或教育文化性质的电视台就代表了在这条道路上的努力。

问题是：在新闻界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为营利而不择手段、不顾事实、不问社会效果、丧失新闻道德原则的现象难以遏制，特别是在电视出现之后，受众不是通过阅读而是视觉形象接受信息，低俗化和节目让广告商牵着鼻子走的情况就变本加厉。媒体培养公众口味，反过来又需要加以迎合，这种恶性循环有可能把社会净化剂的角色变成社会腐蚀剂。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媒体由个人或家族决策变为公司决策，其本身也是产业权势的一部分，这样，利益的考虑更加容易压倒从业者的个人操守和传统原则。

对国外，欠客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形势是美国成为实力遥遥领先的超级大国，其影响无处不在。掌有绝对财力、物力、技术优势的美国媒体也走向国际化。《新闻史》最后提到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信息垄断和交流严重不平等的不满，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此处不赘。作为美国以外的人，特别是中国人，笔者看美国媒体，对它另一个弱点有更深切的感受，那就是与对待国内事物的报道相比，对美国的国际行为的视角往往缺乏客观公正。

除了越战后期外，对于美国对外的征战以及我们称之为“霸权”的行径，主流媒体的态度往往是附和或推波助澜。20 世纪初在美国开始向外扩张时，美国媒体是“显然天命”论的鼓吹者；20 年代的“恐赤病”与 50 年代的冷战，涉及反共主义，很少有冷静客观的报道。例如对中国的报道在尼克松访华前几乎一边倒全是负面，尼克松访华后，对华舆论转变又比较明显；“另类”刊物当然也有，例如《民族》周刊一直特立独行，还有一些左派刊物，但是处于绝对劣势。

又以当前为例：对于以“安然事件”开头的美国公司腐败问题，美国媒体甚为关注，有许多对布什政府尖锐的批评；但是对于美军轰炸阿富汗平民的婚礼这样严重的事件，以及事后军方傲慢的态度，很少见到义愤和公正的批评。又如“李文和事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流媒体一马当先大

肆炒作，美国公众几乎家喻户晓，而等到判定是冤案之后，却悄然无声，也很少媒体质疑这种做法违反民主原则。诸如此类例子很多，不能一一。美国新闻业虽然已经居于世界顶峰，美国的影响在全球无处不在，但是美国一般公众从美国媒体中却难以得到关于外部世界客观、完整的信息。究其原因，新闻从业者本身的意识形态和利害关系兼而有之。因篇幅关系这里不予展开。

新权势，谁监督？

当前，从美国揭露的公司腐败的冰山一角来看，从小布什政府对内政策全面右转、对外空前的一意孤行（即所谓“单边主义”）来看，从美国社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有增无减来看，似乎美国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再来一次“进步主义”运动的冲击、净化，达到改革。美国媒体是否还能发挥当年的作用，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还有足够的活力自我完善，都面临考验。再说，新闻媒体现在自己已经是一方权势，而且是产业集团，那么也就会遵循权力造成腐化的规律，其自身也有一个净化问题，谁是监督它的有效力量呢？

[【返回目录】](#)

David Kaplan: 定义“调查新闻”这门手艺

[**David Kaplan** 资深调查记者、全球深度报道网总监。本文首发于 2018-7-26 全球深度报道网，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 **David Kaplan**

“调查性报道”有很多种名称。有人称之为“深度报道”，有人叫它“企业报道”，也有称“项目报道”，但这所有的名称都笼统归入“调查性报道”这个分类中。什么是调查性报道？不同的人会给你不同的定义，但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大部分都认同这样一些特点。

定义一：系统性的、深度的原创报道

在英语中，调查（investigation）一词的在词典中的第一个定义是“系统的质询”。意思是，你要花时间通过某种系统性的方式去追查某件事情，去分析真实发生了什么。在此这个基础上，你所做的工作还必须是原创的，有深度的。因此，系统性的、深度的原创报道，就是调查性报道。

定义二：从假设开始

“作出假设”是我们对调查性报道的第二个定义。很大程度上，优秀的调查记者会像一个正直的检察官或出色的警探那样思考，他们会对事件先作出一个假设。这是有效的科学办法：先假设，后验证。记者要去到现场，寻找支持或推翻其假设的事实证据。调查报道最困难的点之一，就是当你的发现不足以支持早前你的假设时，你就必须抛弃这个假设。而这就是调查记者的工作。

定义三：分析公开文件和数据

调查报道的第三个定义，就是运用大量的公开文件和公开数据。调查记者经常说要“追踪踪迹”：譬如有关人物、金钱、机构、责任的踪迹，就是通过文件和数据来进行追踪。他们从公开文件上尽可能地收罗线索，或是收到泄密文件和数据，然后，通过分析那些文件，跟踪线索，找出真相。正如电影《总统班底》里的那名“深喉”所说，如果你想知道真相，跟着钱走。如何跟着钱走？路径藏于数据和文件之中。



马克·费尔特 [William Mark Felt 1913.8.17—2008.12.18]
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水门事件关键性人物内线“深喉”

定义四：公开揭露秘密或被隐瞒藏事情的、或是秘密发现

定义之四，调查报道应要把要将被隐瞒藏的、秘密的事情公之于众。调查记者时常要处理秘密信息，尤其是掌握权力的人不希望公开的事情，因为这些信息或让他们难以启齿，或会证明他们滥用了

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职权。调查记者的一部分工作，便是承担那些事实并向公众展示，以便人们了解真实的情况。有时候这不是有意为之的。有时在特定情况下，事实仅仅是隐藏在谜团之中。而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的工作，就是将一些事实的碎片重新拼整，最终得到一个 2+2=5 的结果。

定义五：关注社会正义和问责

调查报道的第五个定义是，关注社会正义与问责。

回顾现代调查报道的开端，比如，一百多年前美国进步时代的揭黑者，他们坚信要纠正社会弊端，保护弱小群体。他们对大型贪腐、医疗事故、大公司虐待劳工和污染环境等问题穷追不舍。这个行业一直在呼吁社会责任，并将此这一使命真正融入到世界各地的实践中。因此，调查性报道有时被称为“愤怒新闻”，是有充分理由的。调查记者是坚定的纠错者。

什么不是调查报道

我们刚刚谈了什么是调查性报道，现在让我们来花几分钟，看看什么不是调查报道。调查报道并不是所谓的“泄密报道”。拿到一份泄密文件或泄密数据并不意味着你做了调查，或是做了“系统性的质询”。回顾最近几年那些涉及大量泄密数据的出色的报道项目，你会发现，泄密数据是调查的开端，而非结束。记者通过泄密数据找出线索，然后进行我们刚才所说的系统性调查。

调查性报道也不仅仅是犯罪或腐败报道。这两者都是报道口，而调查报道可以是有关任何主题的，比如说，健康、教育或人权。仅仅报道非法行为，并不意味着你在做调查报道。那么什么才是调查报道呢？通过和世界各地的调查记者交流，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强烈确信的共识：调查报道是对原始调研的深入、系统性运用与报道，这个过程通常要用到大量的数据、资料，以及公开文件来查明事实真相；同时，调查报道还往往涉及深藏的秘密，使以前被隐藏的信息进入公众视野。最后，调查报道非常强调社会正义与问责。所有这些元素，一起组成了当代的专业调查新闻业。

举例

所谓的“系统性调查”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通过最简单的新闻口报道——比如说火灾报道——来看一下。假设编辑派你去报道一场火灾，那么你需要问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物、事件、地点、原因、时间，对吧？你需要了解有多少消防车回应了警报、有没有人受伤、损失情况如何、火情持续了多久。但如果，当你在报道火灾时，发现消防水管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消防员在抱怨装备质量，然后你再去市政厅查找相关合同文件发现，合同乙方是市长的朋友，并且从全市消防部门的消防装备供应上获利不菲……这个过程才是“系统性质询”。 🧩

[【返回目录】](#)

茅于軾：中国经济中的逻辑

[茅于軾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北京富平学校创始人之一、理事长；2014年茅于軾被英国《Prospect》杂志评选为十位“2014世界思想家”之一，名列第四。本文为中评周刊首发，图表2、3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

这里的逻辑，我定义为任何人不可能反对的道理。比如 A 等于 B ； B 等于 C ；则 A 也等于 C ； A 不大于 B ；也不小于 B ，则 A 必等于 B 。在数学里有许多类似的逻辑。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不可反对的逻辑。比如嫌疑犯不可当法官；裁判员不可下场踢足球等等。

一个命题如果逻辑有错，这个命题不可能是对的。所以检验真理不是靠实践，而是靠逻辑。如果真理是从实践证明的，连贯性定理也不可能被发现。因为在我们的地球上不存在不受外力的物体，而惯性定律要求物体不受外力，才有动者恒动；静者恒静。把实践提高到能够检验真理的位置，极大地妨碍了我国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家只会实践而不会用逻辑分析。我并不否定实践的重要性，真理是靠实践发现的，但是发现了真理以后，这个“真理”是不是符合真理的本质，就不是继续实践，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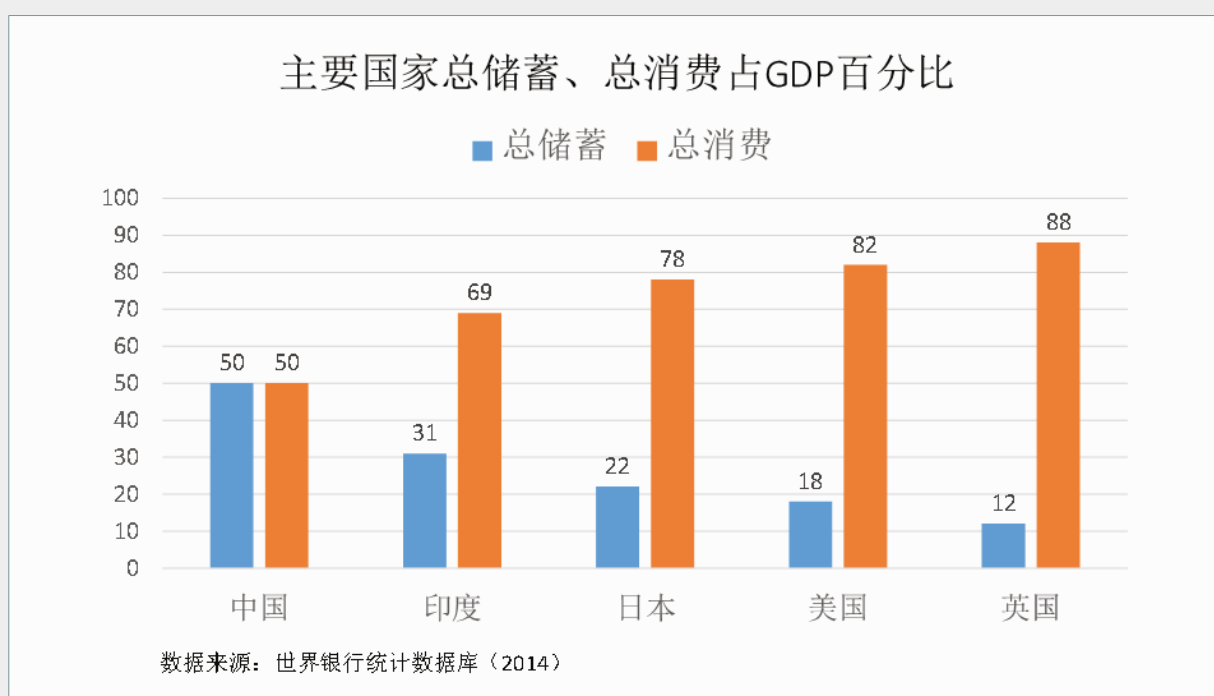
是回过头来用逻辑去检验。

用逻辑检验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国有经济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违背了裁判员不可下场踢足球的基本逻辑。一个国家的政府是管理者，或者说是裁判员，他不可以进入市场去赚钱。正因为这样，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不允许政府开办目的在赚钱的企业。企业只能由民间办，不可由政府办。中国因为国有企业问题多多，几十年来一直讨论国企改革的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其原因就在于国企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国企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把它变成民企。

由于中国的权势人士相信共产主义，宪法上规定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所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企业，如金融、通信、电力、石油、交通等都由国家垄断，民营资本不可进入，或者只能当一个配角，起到帮助国企经营的作用。这种所有制的特点与西方以私有制为主的完全不同。

由于垄断缺少竞争，这些国企普遍效率不高，但是因有垄断地位，靠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赚钱不少。这些大国企所赚的钱都成为政府的收入。所以中国政府除了税收还有国企的垄断利润，非常有钱。在西方企业的收入都归企业的股东所有，也就是都成为百姓的收入。所以和西方比较，中国政府有钱而百姓较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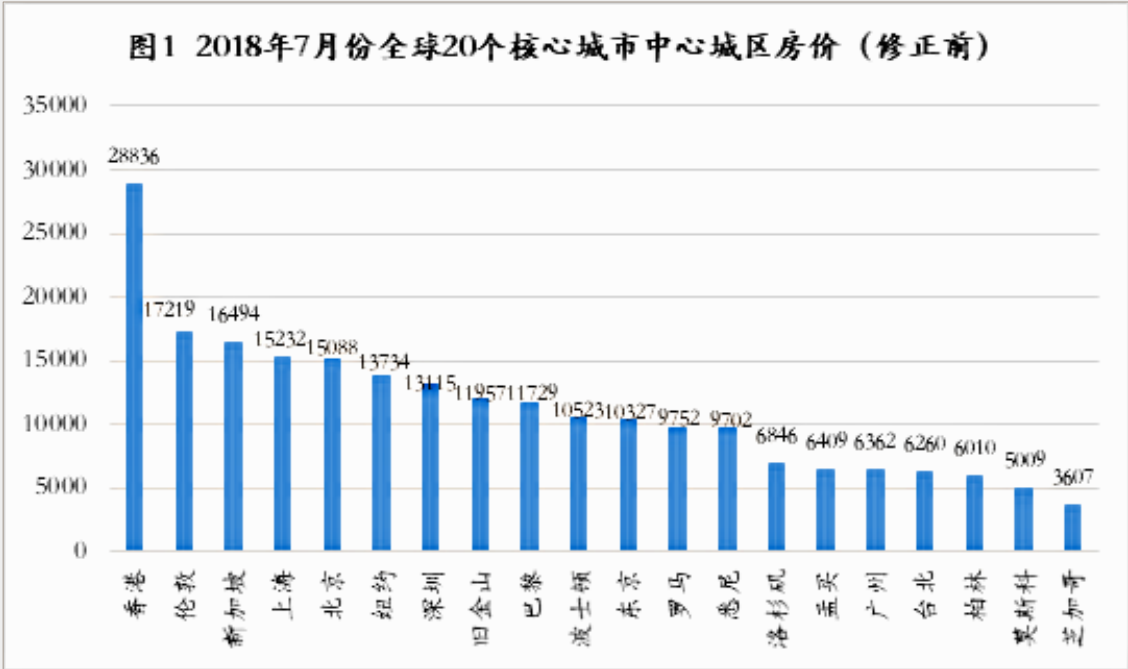
政府的收入除了必要的行政开支，不可以用于消费，只能用于投资。所以中国经济的主要需求是投资，而非消费。请看下面这张图，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储蓄（绝大部分都转换成投资）是最高的。



中国经济的如此与众不同主要是公有制造成的。

中国的政府投资首先是用于基础设施，建高速公路、高铁、地铁、机场、大坝，以及电厂、港口等。因此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许多发达国家都更强。投资业也兴建了许多工业，如钢铁业、水泥业等。所以中国的钢产量达 8 亿吨，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而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 20%。另一方面居民因收

入低而消费弱。结果是产能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解决的办法还是扩大投资，靠投资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这种投资的自我加强在短期能够见效于一时，但不是长久之计。从长远来看，必须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让居民在 GDP 中分配得更多一些。办法是企业要改国营为民营，让企业的收入从政府手中转变成居民的收入。



企业的目标都是追求利润。在法治的环境下，大家都追求利润不会造成冲突，反而能够促进资源配置的改善。所以自由贸易（国内和国际）是促进财富增长的最主要的方法。如果企业的目标除了利润之外还有别的目标，自由贸易的基础就不存在了。国有企业常常会有利润之外的目标。所以对国有企业，自由贸易未必有利于社会。国企往往有国家（不一定是人民）利益的目标，所以 WTO（世界贸

易组织) 的条款未必适用于国企。其他有关于自由贸易的合作协定也未必适用于国企。中国的国企在全世界的企业中是一个另类，他与众不同。

中国大城市房价之高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中国虽然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房价已经超出高收入国家。造成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也与中国的公有制有关。因为百姓的储蓄没有能够获利的投资机会。能获利的投资，如金融业、能源业、通信业等都是国家垄断的。所以百姓的储蓄只能投资于比较自由的房地产市场。大量资金涌入有限的房地产，房价焉能不高。解决中国房价过高的方法，很简单，对民间资本开放垄断业。比如让老百姓开银行，大家就会把房子卖了去开银行，房价立刻就落。要知道，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的银行都是百姓投资开办的。美国有五千多家银行，都是私人投资办的。唯独中国不让百姓办银行，其间接效果就是房价奇高。 🚧

2018-10-5

[【返回目录】](#)

盛洪：宏观税负越来越高 企业利润边际已被减没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9 月 16 日在北京中国经济学 50 人论坛上的发言修订稿]



本文作者盛洪教授

刚才吴敬琏老师讲改革最核心的就是市场化、法制化，的确非常重要。经济学家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有几个方面：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我们提出过渡的步骤、方法、路径；三，进入市场化以后，其实经济学家就没有太大作用了，因为市场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市场中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使效率得到巨大的提高。当然，经济学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当看到市场化可能遭到破坏或者逆转的时候，我们要提出警示。现在可能就面临这样一种时刻。

简单总结一下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我们走向了市场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焕发出巨大的效率提高和财富的涌流。在市场化初期，政府的参照系还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按照过去的参照系来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那个比例”就是宏观税率。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继续涌流，政府分割国民财富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于是分割比例越来越高。

从 1997 年到现在，一般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已经增长了 13 个百分点。加上土地财政、国企净资产的机会收益和社保等等，构成了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最近有一项研究，但是报告没有发出来，这个报告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做了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净资产收益率在

降低。我们用无风险利率加上合理的风险溢价，一相减，得出的数字是负数，意思就是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从 2012 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

今年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今年上半年，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增长速度比 GDP 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第二，2017 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最近又搞了所谓的税改，很多人已经明确指出，这个税改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减了个人所得税，把社保资金等的收缴从人社部转到税务总局。有两点改变：一是征收的社保的提取基数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而是按照实际收入，这其实增加了企业成本；二是税务局和社保中心的性质不同，它具有强制性，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社保缴款比率，增加了宏观税负。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返回目录】](#)

张干帆：如何防止警察性骚扰？

[张干帆 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 FT 中文网]



本文作者张干帆教授

两个多月前，中国的“米兔运动”轰轰烈烈突然降临，不少“公知”大 V 和公益人士卷涉其中，公知圈内也对运动的方式和效果产生了激烈争议乃至撕裂。

当时被忽视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公权力的性骚扰。和警察等公权力相比，公知圈或公益圈的权力资源即便有，也十分有限。受害者尚可能实现私力自救，或诉诸网络舆论使侵害人声名扫地。然而，公权力的性骚扰就远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关系的失衡被放大了许多倍。在职场内部，上级通过巨大的权力资源得以对其下属维持不正当性关系，即便下属不愿意也慑于其掌握的公权力资源而无可奈何；在监狱、看守所甚至一般公众场合，警察等一线政府工作人员则可能依仗手中掌握的强制权力，对普通平民实施性骚扰。最近发生在广州的一起警察针对女律师的恶性侮辱，即为其中的一个恶例。

今年 9 月 20 日，广州律师孙世华女士接到通知前往荔湾公安分局的华林街派出所，办理一家老上访户的取保候审。当她要求主办案件的陈姓警员提供姓名警号时，陈警员用力将工作证甩向孙律师。后者本能地用手遮挡，竟立即被指控为“袭警”！随后遭到暴力围殴、掐脖，并以查验身上是否藏有“凶器”为由被强令脱衣搜身，致使其精神遭受严重伤害。事后看，针对孙律师的暴力侮辱很可能是事先设好的一个“局”，或许是要警告她不要代理老上访户等“敏感”案件，或许是要报复她自己的“敏感”家庭背景——她丈夫是隋牧青，刚刚被广东司法厅吊销律师执照的知名维权律师。具体出于什么

动机，局外人不得而知，但不论是哪种动机，针对孙律师的暴力侮辱显然是严重的公权滥用，不仅和正当合法的警察职能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涉事警察个人已经触犯刑法。

事实上，广州警察针对女律师的侮辱已经不是普通的性骚扰，而是已经构成“强制猥亵”或以暴力胁迫“侮辱妇女”的犯罪。刑法第 237 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条很适合对孙律师实施恶性侮辱的警察，其“暴力”、“胁迫”、“强制”等方式显然存在。就在这起事件当中，受到强制猥亵或侮辱的女性即不止孙律师一人，而是还有两名女上访人，其中一人因为用手机拍摄了现场视频而被强令脱衣搜身。可见某些警察对于玩弄公权、胁迫侮辱妇女已经习以为常。

由于公权力未能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警察侵犯上访人、维权律师的基本权利等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其中对于女性的侵犯性质尤其恶劣。如何防止这个特定场景下的公权滥用？这是一个老话题，我也没有什么良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受害人像孙律师那样，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公权滥用的恶劣行径并追讨他们的法律责任。即便不能将恶警绳之以法，也要让他们声名扫地。我也希望“米兔”与女权运动的倡导者不只是聚焦于公益公知圈，而是更多关注被公权力粗暴侮辱和骚扰的女性。 ■■

[【返回目录】](#)

冯兴元：“公地的悲剧”与自主治理的逻辑

[冯兴元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本文首发于本文首发于《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4期，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冯兴元教授

在公共牧场，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负担。随着放牧的羊的数量增加，到了一个门槛之后，就可能出现草地过度放牧，从而造成草地退化，最终影响羊群的可承载总量以及全体牧民的收益。但是，单个的牧羊者往往会不顾草地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数量，从而增加收入。看到这样做有利可图，许多牧羊者也纷纷效仿，加入这一行列。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牧场最终被过度放牧，草地迅速退化。这样就产生了每个牧羊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悲剧现象：过度放牧导致草地退化，导致羊只可承载总量的减少和全体牧民收益的下降。

上述这种现象就是美国学者哈丁（Hardin）所指的“公地的悲剧”。1968年，哈丁发表《公地的悲剧》一文，描述了上述悲剧故事。在“公地的悲剧”故事中，个体理性行为与“集体非理性”（这里的集体，更准确的是指“群体”）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个体层面，每个牧羊人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都增加羊只，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群体层面，过度放牧和草地退化使得草地的羊只可承载总量下降和全体牧羊人的收益总体下降。哈丁所说的公共牧场的“公地悲剧”问题确实也适用于中国的牧区。现在我国牧区的一种做法是推行禁牧圈养制度，即禁止自由放牧，把牧场切块，之间筑起围栏或者拉起铁丝网，分给牧民家庭使用。牧民所分到的草地部分用于种草，部分则转为耕地。



加勒特·詹姆斯·哈丁 [Garrett James Hardin 1915.4.21—2003.9.14]

美国生态学家，他在 1968 年在《科学》期刊发表的文章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的理论模型

我们在内蒙古阿拉善盟能够看到这种情况。但是随着这种做法的推行，草地资源并不一定落到最能利用草地者的手中，而且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退化的草地。据说草地继续退化的原因很多，包括：一是很多牧民家庭分到的草地不一定有水源，结果需要打井，加速破坏生态；二是牧民的围栏种草导致生态区的碎块化，使得草原生态脆弱；三是适当的放牧本来可能刺激植物发挥顶端优势（例如绵羊吃草的上端），牲畜粪便本身就是肥力，可以提升草地密度，而现在无法发挥这一优势；四是种草之后，为了保持草地肥力，估计需要和种稻一样使用化肥农药，结果使得草地的农药化肥残余量累积增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1933.8.7—2012.6.12]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亦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有关公共牧场或类似公共牧场的“公地的悲剧”问题，真正比较妥善的解决方法是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解决方案。奥斯特罗姆分析了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似于公共牧场性质的所谓“公共池塘资源”案例，包括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情况等，提出需要组织“使用者协会”实现自主治理。这里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公共池塘资源”，就是在消费上（也就是使用上）一方面具有非排他性，另一方面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它们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奥斯特罗姆总结和界定了八项构建自主治理制度的原则：一是确立清晰的边界，即明确界定有权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范围；二是要结合当地条件及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供应规则来确立有关占用“公共池塘资源”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数量的规则；三是达成的集体选择的安排，要体现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四是实施监督，即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要么是对占用者负责的人，要么是占用者本人；五是推行分级制裁，也就是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制裁，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六是确立冲突解决机制，使得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七是确保对自组织权得到最低限度的认可，即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八是利用多层分权制企业组织形式，

这里涉及到，当事关较大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企业中，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多层次的分权式组织。

与公共牧场这种有形“公共池塘资源”相差较大的、无形的、广义的“公共池塘资源”，也都有可能产生“公地的悲剧”。比如，社会信用环境就是这样一种广义“公共池塘资源”，如果被很多个体滥用，就容易恶化，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即由于赖账者多，那些愿意还钱而且有能力还钱的借款人也不容易借到钱，即便能够借到，其利息因为放贷人或者信贷机构考虑风险溢价而大幅提升。当前我国 P2P 网贷平台数量众多，但是问题平台和“跑路老板”也很多，信用环境的恶化就容易使得整个行业走向“公地的悲剧”。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法治下的自主治理。

连政府诚信也可视为一种广义的“公共池塘资源”，也可能遭遇“公地的悲剧”。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曾提到“塔西佗陷阱”：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这里的“塔西佗陷阱”就是“公地的悲剧”。针对社会信用环境恶化或者政府诚信遭遇“塔西佗陷阱”问题，其出路还是法治下的自主治理：就像美国和瑞士这样的国家，每一级辖区都是在法治下自主治理的。除了公共治理领域之外，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也都是法治下的自主治理。 ❷

[【返回目录】](#)

科斯：中国改革没邓小平 将完全不同

[**罗纳德·哈里·科斯** Ronald H. Coase 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王宁** 美国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浙江大学科斯研究中心国际主任。本文转载自 2011 年 1 月 7 日凤凰财经，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罗纳德·哈里·科斯

为庆祝罗纳德·科斯教授百岁华诞，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其它学术机构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京组织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并邀请科斯教授、张五常教授和科斯教授的助理王宁先生通过网络视频参加了会议。此外，科斯教授的助手王宁先生还在 2010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期间，在美国芝加哥对科斯教授进行了采访。

科斯教授由于“发现并阐明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杰出贡献，于 1991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于 1910 年在伦敦出生，后于伦敦经济学院

就读、任教。1950 年移民到美国，先后于布法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任教，之后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1982 年科斯教授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退休。



科斯教授接受美国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宁的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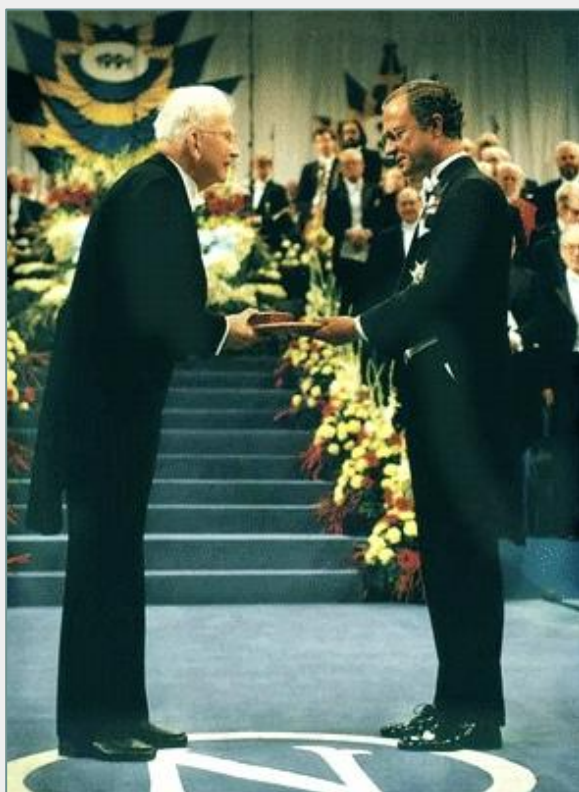
图片来源：Chicago Multimedia Initiatives Group

早在学生时代读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科斯教授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科斯教授极力建议张五常先生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他认为香港大学是当时对中国最新的经济改革进行研究的最好的地方。1993 年，科斯教授邀请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近几年，科斯教授还通过科斯基金会，组织并资助了 2008 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30 年”，以及 2010 年芝加哥研讨会“工业的生产结构”。在 2008 年芝加哥国际会议上，学者(来自中国和北美地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历史学家以及法学家等)，中国的政府官员及企业家们共聚一堂，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转型进行了深入探讨。2010 年，芝加哥研讨会对中国工业的生产结构进行了讨论。科斯教授与王宁先生合著的“*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将在 2011 年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公司和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共同出版。

新成立的科斯中国学会以促进科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宗旨。科斯教授称“科斯经济学”为“正确的经济学”。他认为，正确的经济学应当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如果加以适当运用，经济学应当能够阐明经济系统是如何运行、当系统运行出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科斯教授认为，经济学有很多方面要多向生物学和医学学习——这两个学科从细胞层次逐步上升到生物个体层次来研究人体的总体运转、不同器官之间相互协调方式，以及当某个地方出现问题需要修复时该怎样做。

王宁先生自 1998 年起担任科斯教授的助手，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于美国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在接受王宁的采访时，科斯教授对科斯中国学会的使命、对经济学的展望、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任重而道远的使命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科斯教授接受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张五常成为朋友是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王宁：首先，科斯教授，祝您生日快乐！您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将要在北京举行“科斯与中国研讨会”来庆祝您 100 岁生日。据我所知，除了卡尔·马克思，还没有哪个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赢得过如此崇高的敬意。原因是双重的，首先是因为您的思想的巨大影响，其次是因为您对中国的特殊感情。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礼尚往来。很多中国人想要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使您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

科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兴趣。很早很早以前，早到我都记不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了，我就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了。很多年前，可能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事实上，我觉得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对它印象深刻。几百年前，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中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这个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王宁：您跟张五常教授的关系，是否也对您的中国印象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科斯：没有。早在我见到任何中国人之前，我对中国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了。当然，我跟五常的关系很好。很多年前，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待了两年，我们经常一起聊天，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这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我觉得那段生活对我们都获益匪浅。不幸的是，两年后，他去了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我时常觉得那是一个错误。

王宁：我记得张五常教授曾经跟我说，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唯一后悔过的决定。

科斯：五常说过他在香港长大，很想念大海。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理由。

王宁：如果五常留在芝加哥大学，您认为这是否会妨碍他发展出自己的思想？当时芝加哥大学里人才济济，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以及其他重量级经济学家很很强势。

科斯：这个其实是不会发生的。我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和在布法罗大学其实是一样自由的。

王宁：我觉得您是对的。按照张五常教授的性格，我觉得应该没谁能阻止得了他发展自己的观点。

科斯：我很高兴后来我极力建议他去香港大学。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有多么好。但现在看到五常在中国的影响，我觉得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

王宁：在发展和阐述您的思想方面，张五常教授在中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这点来看，当年他去西雅图，也对像道格拉斯·诺斯和约拉姆·巴泽尔那样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记得诺斯说过很多次，他是从张五常教授那里学到了交易费用经济学，而张五常教授则是从您那里学来的。

科斯：五常无论在哪儿都会取得很大的成绩，这点我从来都不怀疑。好的经济学吸引好的经济学家，如果他当年留在芝加哥大学，他应该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1991年12月张五常夫妇赴斯德哥尔摩参加科斯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科斯与张五常夫妇的合影

王宁：您可能是对的。如果张五常教授当年留下了，那么即使到他回香港大学之前，“科斯—张五常”工作小组也会延续10多年。按照您的性格，您不会在芝加哥大学强势地推行您的经济学观点。但如果您和张五常教授并肩合作，那您所提到的好的经济学可能就会在芝加哥大学流行开来。

科斯：是这样。

不喜欢“科斯经济学”这个词

王宁：您多次提到您不喜欢“科斯经济学”这个词，更倾向于直接称为“正确的经济学”或者“好的经济学”。您认为“好的经济学”跟“坏的经济学”，或者“正确的经济学”与“错误的经济学”的区别在哪儿？

科斯：我所说的坏的或者错误的经济学，是我叫做“黑板经济学”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不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那些只存在于经济学家头脑中的想象的世界，比如说，零交易费用的世界。

在经济研究和科学追求中，思想和想象都极为重要。但学科的研究对象必须是真实世界，而不是想象的或虚构的。

王宁：既然科斯中国学会是以您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我们就免不了要用“科斯的”这个词。

科斯：我不喜欢“科斯经济学”这个词。我头脑中的“正确的经济学”，也就是你们称为“科斯经济学”的经济学，其实是经济学本来应该的样子。

王宁：这个绝对正确。建立科斯中国学会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正确的经济学”，使其流行开来取得成功。

王宁：很多中国人想要问您的第二个问题是：您觉得其他国家能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中学习些什么？我们能否从中国模式中总结出一些共性的经验？

科斯：我还不知道。在我们开始试着学习之前，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能学到什么。

王宁：我觉得您这个观点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我理解得没错的话，您的意思是说，向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学习，不同于学习一本书或一个食谱，而更像是通过做事来学习。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实验，那么向中国学习也是一个实验。不同的国家即使是向同一个模式学习，他们也会学到不同的东西。

科斯：是这样的。我们所做的都是实验。

王宁：您的话让我想起了邓小平的“改革就是实验”的说法。但实验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我们都记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验、大跃进，等等。

科斯：没什么能保证一定会成功。人生来就是容易犯错的，我们会经常地犯各种错误。

王宁：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从实验中学习。或者说，就是我们以何种方式来构建经济和社会，才能使我们以可承受的代价来促进群体学习的问题。

科斯：对。哈耶克认为，由于社会中的知识是分散的，所以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

王宁：知识的分散化也造成了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互相竞争的思想之间的冲突。据我所知，只有人类才会为自己的观点而战(宗教或者意识形态观点)，也只有人类会愿意为自己的观点牺牲自己。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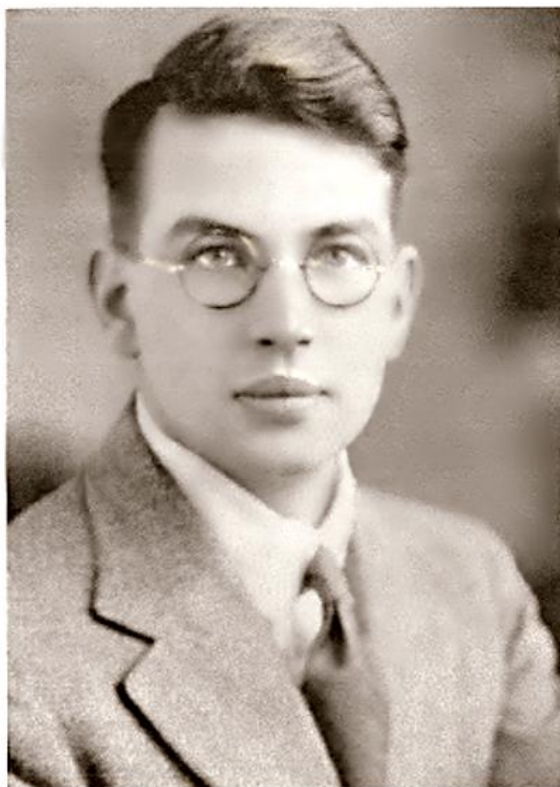
世界是血腥而野蛮的。但据我们所知，动物是不会为观点而斗争的。

科斯：这可能是对的。这也是我们需要思想市场的原因。思想可以相互竞争，但持不同思想的人们是不需要互相杀戮的。

王宁：这似乎是所有政府的第一要务：为各种观点培育一个活跃的思想市场，以维护文明的秩序。

科斯：对。

王宁：您说过很多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非同寻常且出人意料的。第三个问题是：您认为，这场出人意料的转型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Ronald Coase, an LSE student from
1929–1932.

青年时代的**科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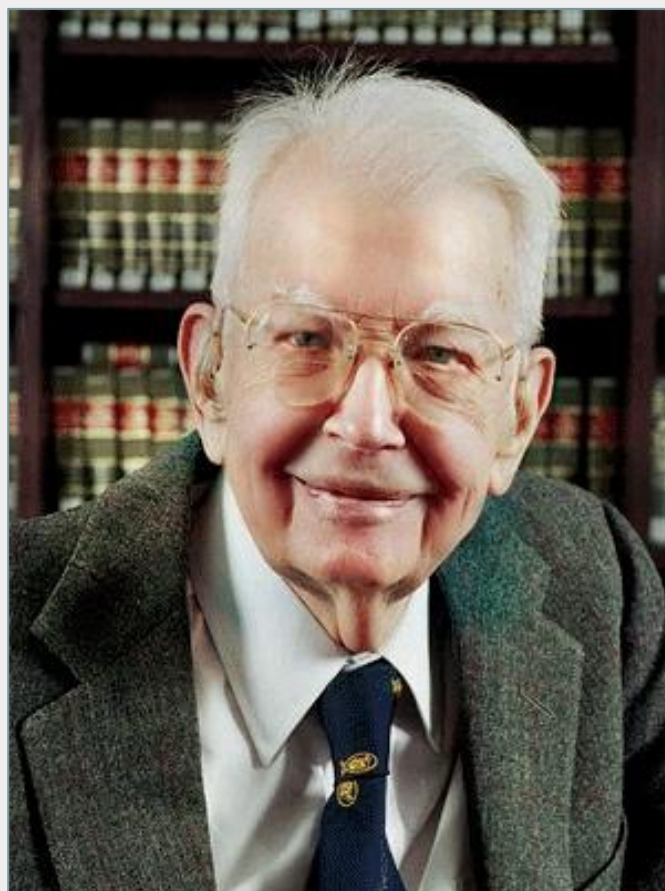
科斯：关于这一点，在我们合著的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一书中进行了解释。这场改革是在人们的意料之外的，没办法提前预测。这应该跟一些个人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没有邓小平，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些在我们书中称作“边缘革命”的发展，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等，我们是可以预料的。但当这些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又感到非常惊讶。

王宁：确实是这样。中国人自己也感到很惊讶。

未来的经济学将由中国主导

王宁：第四个问题：您对中国寄予厚望，认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是什么使您这样想的呢？

科斯：这个很明显是中国的人口规模。新的思想总是被一小部分人所接受，但中国的一小部分人就是很多人了。



已经百岁高龄的**科斯**教授

这也跟中国现在对新的思想接受度很高的事实有关。旧的思维方式已经被抛弃，但新的方式还没有发展起来。在中国，新的“好经济学”和新的“坏经济学”都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想要看到“好经济学”流行起来取得成功。

中国还有一个优势。正如我们的书中所写的，我们要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学习的经验还有很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如何运行以及如何随时间而发展的，我们还要作很多研究。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成长起来，迎接挑战，将会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1988年我曾给盛洪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我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而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王宁：您的话深深打动了我。这会给中国经济学家极大的动力和信心去发展自己的观点。

科斯：这也正是他们所应该做的。这也是我不喜欢“科斯经济学”这个词的另外一个原因。如果

我头脑中的“正确的经济学”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就on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叫做“中国经济学派”。

王宁: 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您的意思是说, 科斯经济学或您所说的“正确的经济学”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 您相信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可能发展这个学科。



科尔夫妇在 2008 年芝加哥大学《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会议上

科斯: 对。我觉得顺从权威是中国人的一个不好的特点。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做的, 是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进行认真系统的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观点。我的论文, 《企业的性质》或者《社会成本问题》, 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我的以及别人的论著所能做的, 至多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

认真研究是得到全面观点的唯一路径

王宁: 我同意。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 他们要么走自己的路, 要么无路可走。最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没能做出合理清晰的解释, 让中国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主流经济学的缺陷。

科斯: 我认为, 科斯中国学会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促进中国经济学家独立思想的发展。学会不是要发展成一个大的组织, 而是要成为一个由很多学者群组成的网络。每个学者都应该竭尽全力对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每个学者群形成一个小团体, 就中国经济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地区进行

研究。我们要鼓励各种类型的研究，历史的、统计的、或者分析的，只要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或变革提供了新的认识。这是得到全面观点的唯一路径。

王宁：是的。学会将与中国的大学进行广泛合作。中国的大学可以成为学会的会员，根据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专注于某些经济问题的研究。比如，浙江大学所处的位置非常适合其研究温州和义乌的发展，以及其他的浙江省的独特经济现象。



2010年9月4日，周其仁到科斯教授家中拜访

科斯：学会推动中国的“正确的经济学”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学家进行“正确的工作”的一个方法是创办自己的期刊。我担任《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的时候，非常主动、积极。我参加很多研讨会和其他会议，跟大家交谈，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如果我觉得他们的研究很好，我会邀请他们投稿。到了后来，我会直接跟大家交流，建议他们去做哪些研究，并承诺会发表他们的文章。

王宁：这跟现在期刊的运行方式确实是非常不同的。

科斯：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没有其他哪个期刊会这么做。大多数期刊的主编都是等着人们投稿，然后请外面的评审者挑选适合发表的文章。这跟我的工作方式不同。我知道自己想要出版哪些类型的文章，所以我到处找人写这样的文章。

举个例子。当年伯纳德·西根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研究员的时候，他说他想写一篇关于分区制利弊的文章，我建议他去找一个没有分区制的地方，就土地使用方面跟有分区制的地方进行一下比较。最后，他写出了一篇关于无分区制的休斯敦地区土地使用的非常好的文章(Non-Zoning in Houst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科斯教授与诺斯教授、蒙代尔教授、德姆塞茨教授和茅于軾教授

另外一个例子是五常的关于蜜蜂的文章。我知道华盛顿州存在养蜂人和果园主之间的合约。我请五常去进行调查。他做了一个非常棒的研究(The Fable of Be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3))。

理查德·桑德尔写了一篇关于人造板远期合约市场建立的论文，但这个远期合约市场最后失败了。桑德尔非常沮丧，因为没有人愿意出版关于失败市场的论文。我一点都不沮丧，因为大多数市场都失败了。这篇论文恰恰揭示了建立一个市场有多么困难。我发表了他的文章(Innovation by an Exchange: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ywood Future Contrac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3))

王宁：我觉得这是您对这个学科的最大的贡献之一，但机会成本可能也非常大。在您研究的巅峰时期，您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这个杂志上，而不是自己的研究上。您完全有可能再写出一两篇像《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那样的文章。

科斯：我对自己的决定一点也不感到后悔。这是我来芝加哥大学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这是发展一个学科的唯一途径。要不是为了这个杂志，很多文章可能根本就不会发表，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写出来。

王宁：根据您的经验，如果学会要办一个期刊，您觉得该怎么做？

科斯：要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想发表什么样的文章，推动哪种类型的研究，等等。不要担心别人对你的观点怎么看，毕竟你不可能控制别人的想法，也不可能垄断整个领域。只要你坚信自己的观点，你就要极力维护你的观点，宣扬你的学说，直到你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一天。这是取得学术独立的唯一途径。

王宁：我完全同意。但我觉得我们找不到第二个科斯。您创办《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的时候，您在这个专业中的地位就已经不可动摇了。您的观点，不管是关于什么的，都会得到高度重视，并被广泛接受。

科斯：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自己的观点经常跟主流观点不一致。即使是在现在，我对本学科的观点也是经常不被业内人士所接受。但要使科斯中国学会取得成功，你肯定不需要有第二个科斯，你们将会有张某、王某，或其他姓氏的中国人。

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产权系统

王宁：我还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说中国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转变到了没有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这是怎么做到的？

科斯：各国的产权系统是不尽相同的。以前人们将产权系统划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把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把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这种分类方法过于简单。英国和美国的产权系统是不同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与前苏联的产权结构也是不一样的。能够使各种经济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产权系统就是好的产权系统。我认为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产权系统，至于其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并不重要。

王宁：第二个问题。在您百岁生日之际，您想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说些什么？

科斯：我想说的其实跟我的生日没什么关系。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做的，就是以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为基础对中国经济进行研究，采取历史研究、统计研究或分析研究等形式。不管采用哪种形式，都一定要建立在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的基础之上。

王宁：这个任务看起来并不困难。

科斯：这当然不会像 $E = MC^2$ 那么困难。但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是很复杂的，它由很多的组成部分组成，并且每个组成部分本身又是一个微型的系统。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整个系统的运行，是非常之复杂的。用汇总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并不会让你对经济运行有很多的了解。

王宁：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科斯中国学会在近期应该做哪些事情？

科斯：学会要尽快运转起来。我的意思是说，学会要尽快在中国开展研究活动。我见过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读过他们的很多作品。他们非常有才能，他们的一些作品也是非常有前途的。只要学会能够促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如果办期刊能起到

更好的效果，我们就办一个期刊;如果需要举行研讨会或其他会，我们就办会;如果学会需要资金，我们就去找资金。我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业家们会大力支持这个学会，积极资助这个学会的研究工作。

王宁： 科斯教授，非常感谢您。我迫不及待地想跟我的中国同事们分享您的热情并转达您的殷切期望。您的工作以及您对中国的热爱感染了很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他们对您充满崇高的敬意。我坚信科斯中国学会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科斯： 我现在已经 100 岁了。到了我这个年纪，在生活中经常感到很吃力。就像我经常对你说的，人千万别老。不过我确信，中国的经济学家定会尽自己的努力搞好研究，并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

[【返回目录】](#)

茅于軾：怀念余大章老师

[茅于軾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本文为中评周刊首发，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余大章先生

天则所是 1993 年成立的，至今已经 25 岁了。除了创办人之外，余大章老师是最早参与，而且在所里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员。他的去世是天则所的一个巨大的损失，也是我们全体员工感到非常悲痛的一件事。

天则所作为一个学术机构需要与经济学界的人士保持联系，我们的活动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从中能够受益。但是要找一位熟悉经济学界的人很不容易。理想的人选不但熟悉他们，更要能够对这些学者的个人，和他们的作品有所了解，还能够判断他们研究成果的水平，所以需要他本人有很高的学术修养。这样的一个人到哪里去找？这时候张曙光想起了余大章，提出邀请余大章参与天则所，得到当时全体同仁的一致赞同。这大概是 1994 或 1995 年的事。

余大章来所后一直担当学术部主任。在天则所这样一个学术机构里，学术部主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拿双周学术报告会来讲，事情是张曙光负责，而具体的推进，比如推选评议人，通知评议人，事前给评议人发去报告内容，以便评议人能够针对报告内容发言。小到给报告人和评议人发交通补贴，这些事都是余大章亲力亲为，一丝不苟。

在这过去的 25 年中,天则所搬了六七次家。有一段时间天则所的办公地点离开余老师的住地很远。但是他总是第一个到班,从不迟到早退。在许多方面他是我们全体员工的榜样,所以在好几次天则所的年会上他被选为模范,得到奖励。



余大章先生和天则荣誉理事长茅于軾在天则所年会的合影

余大章老师为人平顺,又不失原则。这样的个性是自身修养的外在表现。大家称呼他为余老师,确实名副其实地他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老师。

我因年龄关系逐渐退出了天则所的各种活动,现在很少去所里,因此错过了所内纪念余老师去世的纪念活动。现在特写此文,以表我对他的追忆。 🍷

[【返回目录】](#)

丹·桑切斯：不向邪恶低头的米塞斯

[丹·桑切斯 Dan Sanchez 自由主义作家, 经济教育基金会编辑。本文首发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 (米塞斯诞辰) 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网站, 译者: 禅心云起, 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 转载请注明]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1881.9.29—1973.10.10]

奥地利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院长、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他的理论影响了之后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穆瑞·罗斯巴德等人，并对 20 世纪中期自由意志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天，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诞生 135 周年。104 年前，他的第一部伟大作品《货币与信贷理论》问世出版。米塞斯写下这篇论文之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凶兆降临的黑暗前夜。这一写作计划因此更加紧迫，论文的谋篇布局也深受干扰。他在备忘和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我能清静工作，有时间从容支配，我会以直接交换理论开篇，接下来才是间接交换理论。但我实际是从间接交换入手，因为我认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我深知，我们正处在大战的前夕。我想在战争爆发以前，尽快完成我的书。因此，我决定，只在几个关键点上，才会超出严格货币理论的狭隘领域，而对于一部较完整作品的准备，则留待来日”。

这位经济学家，尽管年纪轻轻，在学术上已有深厚造诣。他也许在 20 世纪的下一个十年，就可以写下像他后来的巨著《人的行动》那样的经典，对经济学进行系统严密的阐述，为古典自由主义提供

绝佳的理由。

然而造化弄人，米塞斯，以及他那些居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巅峰的代表性思想，要等到西方世界完全放弃这项传统、接受全权政府、走向自我毁灭的那一刻，才迟迟登场。和平与市场，因为战争与计划，遭受遗弃。米塞斯身为自由主义的终极骑士，源自以下两层意义：他既是最伟大的骑士，也是最后的骑士。

米塞斯和世界大战

自由主义时代的丧钟，在一战的炮声隆隆中敲响。米塞斯几乎没有充足时间来完成、出版和捍卫他关于货币的论文，就被派往东线担任炮兵长官。

条件相当的其他学者，获得了战争筹划室的安全职位。然而，米塞斯，因其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不见容于奥地利的权势阶层，而被直接置于险境当中。一名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距其人生在起步阶段的湮灭，只差一个气浪滚滚的爆炸。

这会是怎样的悲剧！米塞斯尚未写下他 1920 年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其中包含空前有力的反中央计划论证。试想一下，作为中央计划完美化身的战争，扼杀了中央计划最严厉批评者的思想。

如果你设身处地，成为火线上的米塞斯。你，比历史上任何人，明白和平市场社会的运作方式。你理解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致命缺陷，而战争不过是徒劳一场。你掌握着答案！你知道释放人类潜能的社会法则。

但是，没人会关注你，毁灭和疯狂包围着你。况且，这场在你身边肆虐的战争，随时可能把你整个吞噬。你心中洋溢的未形成文字的全部思想，对于人类而言，都将永远消逝。

更加勇往直前

这一切，几乎足以击垮任何人。不过，幸运的是，米塞斯不仅仅是天才，还是道义勇气的典范。在身处绝境的危机当中，以及在他所有后来经历的考验中，米塞斯用一句他在学生时代铭记的拉丁诗歌，来鼓足自己的勇气。

“在不可逃避的灾难面前，一个人要如何活下去，取决于他的气质。上高中时，按传统，我选择了维吉尔的诗句作为我的座右铭：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不要向邪恶低头，而是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我回想起这句话。一次又一次，我遇到以清醒理智来看无法逃生的境况；但出乎意料的命运之手，又让我绝境逢生。即便如今，我也不会丧失勇气。我想做经济学家能做的一切。我会不懈地说出我所知道的真理”。

他永远忠实于这一决心。从不在原则上妥协，是米塞斯终其一生的形象。一个莱奥尼达斯式（注：战死在温泉关的斯巴达王）的知识分子，在成群结队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货币狂想者的围攻

下，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便受到老友——那些被凯恩斯革命席卷而去者——的背弃，他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他依旧在战斗。他不仅为子孙后代而战，还为自己而战。



米塞斯和他深爱的妻子玛吉特 Margit von Mises

对米塞斯而言，仅凭《货币与信贷理论》，一本传世之作，从理论上揭露通货膨胀政策的愚蠢，还远远不够。他还亲身与两次大战间歇期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政策对抗。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从恶性通胀中拯救他的祖国——这样的通胀，即将降临魏玛政体的德国，促成纳粹的崛起。

对米塞斯而言，仅凭《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另一本传世之作，从理论上证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疯狂，还远远不够。他还亲自劝说维也纳最有权势者，让这座城市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涂炭——这样的主义，即将席卷俄罗斯，导致极度的匮乏。

他还试图从战争的蹂躏中，拯救他的文明。在他 1919 年的著作《民族、国家和经济》中，米塞斯向欧洲介绍了一个可行的路径。自决的想法，不应只是作为一种战时口号，而应作为一种政治现实来加以应用。即允许每一群人，无论规模多小，从统治性政治实体当中，自由地宣告独立。退出原则，与普遍的自由贸易相结合，将会带来和平。米塞斯甚至表示，如果可能的话，退出原则应该一直向下延伸到个人的层面。

米塞斯做出一个不祥的预言。无论德国对和平的条件感觉多么屈辱，都不应寻求任何报复。把德国的怒火引向复仇，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和欧洲旧世界的文明一道被摧毁。简言之，他警告的东西，后来演变成二战的大屠杀。

不幸的是，他的反战努力，并没有像他在经济上的积极行动那样，产生巨大的反响。然而，米塞斯的努力，可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乃至千百万人的人生。米塞斯的影响，也不限于奥地利。他甚至在德国得享盛名，这里的智识领域，过去由“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把持。他成功把社会科学领域最聪明的年轻德国学者，转变到支持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来。

米塞斯对抗希特勒

在《米塞斯大传》中，许尔斯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悲剧性转折：

“正当米塞斯终于开始在年轻一代德国经济学家当中，激起自由的精神，老一代‘讲坛社会主义者’取得了毁灭性的最终胜利。1933年1月30日，他们在智力上的衣钵传人，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政府总理”。

随着纳粹威胁的不断逼近，米塞斯作为一名犹太自由主义者，被迫离开他的祖国奥地利。后来，德国警察闯进米塞斯的维也纳公寓，没收了他的论文。纳粹分子知道，一间装满米塞斯文字思想的办公室，比起盟军的任何一所军械库，对他们这帮人来说，是更大的潜在威胁。

在瑞士，米塞斯终于找到必要的栖身之所，写下他的系统性论文：《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人的行动》的德语版前身。

米塞斯在他30多岁时设想的“较完整作品”，最终在这里实现：社会科学的权威阐述，以及自由社会颠扑不破的理由。

这本书，套用大卫·休谟对他自己伟大著作的说法，“在开始印刷时就胎死腹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欧洲的心灵再次染上疯病，迷醉于自我摧毁。即便这本书如此炉火纯青、令人信服，也没有片刻时间或丝毫关注，可以留给自由主义。

再一次，不仅是米塞斯的思想，甚至他的人身，都岌岌可危。德国特工要绑架米塞斯，当真间不容发。瑞士高耸的阿尔卑斯山，也无法继续庇护米塞斯不落入希特勒的魔爪。

为逃出欧洲大陆，米塞斯和他的新婚妻子，首先必须乘坐客车，从瑞士远赴葡萄牙，全程充满虎口逃生的惊险。

米塞斯和经济教育基金会

米塞斯一家终于在纽约找到了安全港湾。然而，人身有了保障，并未伴随着财务保障。米塞斯和他的妻子，发现全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米塞斯的大部分积蓄，已遭纳粹没收。然后，像米塞斯这样的学识渊博者，居然遍寻不到教职，因为美国各大学，与欧洲学术界一样，几乎成了反资本主义的大营。

如果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他可以轻易地在一所名校安身。但米塞斯就是毫

不退缩。与往常一样，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而不屈服。誓不低头（Tu ne cede）！

幸亏美国仍有个人主义者存在。一些爱好自由的人，发现米塞斯的见解，让人有如露入心、醍醐灌顶之感。在这些人当中，有好几位，主动向米塞斯提供资金和职业支持，以协助他往后取得丰硕的成果。大多数这些支持者，与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FEE）关系密切。

由于这样的支持，米塞斯得以在他的巨著《人的行动》当中，再次用英语（他迅速学会用这门语言娴熟地写作）阐述他系统性的社会理论。为使这部永恒杰作降临世间，经济教育基金会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于一位名叫穆瑞·罗斯巴德的年轻经济学者来说，阅读《人的行动》，可是改变一生的大事。他立即转变为一名铁杆米塞斯主义者。紧接着，罗斯巴德在米塞斯著作的基础上取得建树，从而为多年以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人的行动》的影响，触动了从安兰德到戈登·图洛克等许许多多伟大思想家的生命之弦，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依然如此。

米塞斯为自由战斗到最后一刻，他在 80 岁上写书，在 90 岁上发表演讲。他最后的一场演讲，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当时，有一位叫罗恩·保罗（注：美国著名政治家，号称“茶党”运动之父）的年轻医生在场。保罗医生驾车 50 英里来倾听米塞斯，据他后来的回忆，这场演讲有“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

在他生命的最后，米塞斯只有一个遗憾：他的生命力处在衰减之中，而他尚有“许多东西要给予人们、给予全世界”。米塞斯虽死犹生：对他的人类同胞充满友善，不懈改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际遇。

米塞斯人生和事业的影响，迄今有如洪钟大吕般回荡了一个多世纪。他的著作和榜样，在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中，仍然历久而弥新。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终有一天能够治愈我们最大的病痛。而他的楷模，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勇气，那些我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考验所需要的无上勇气。 ■

[【返回目录】](#)

茅于軾：也谈《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茅于軾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本文首发于《读书》1996年12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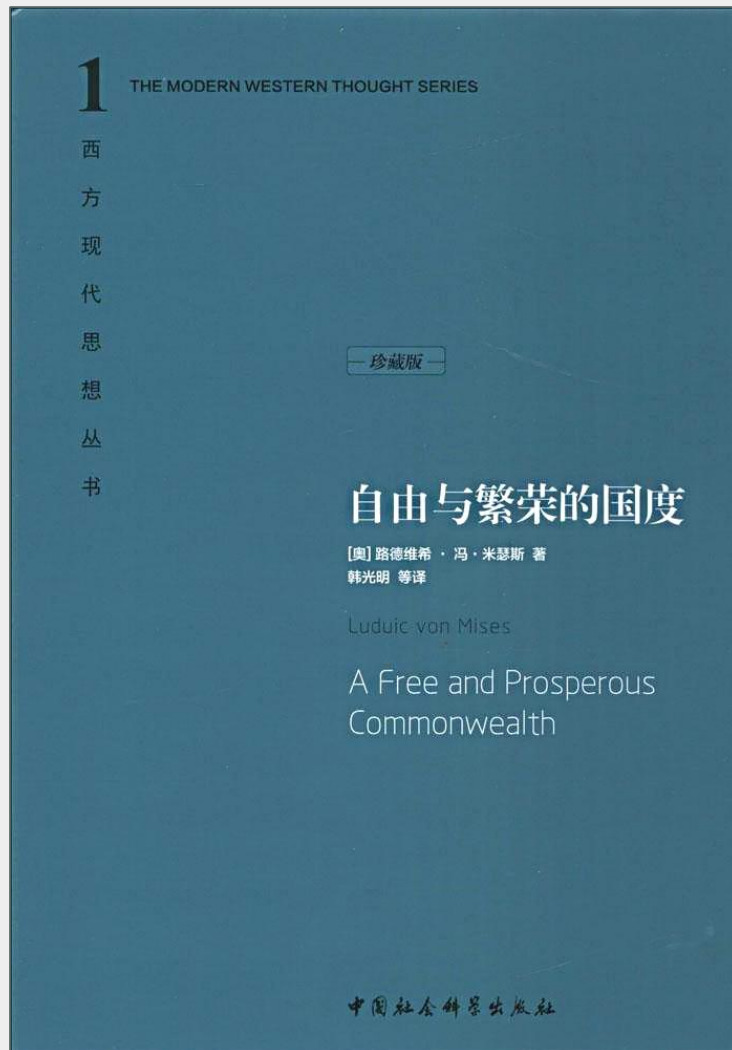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七月中旬参加了一次《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的读书讨论会，会上我有一个发言。以后又看到了《读书》今年第八期上刊登的蔡晓的文章《一曲自由主义的挽歌》，读后极有感慨，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它对我们有什么价值，亟需澄清。于是成了这篇文字。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出版，距今已有七十个年头。在这七十年中地球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书，看看他在七十年以前所提出的主张和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米瑟斯思想的重大意义。在这七十年中最主要的事件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平力量战胜了法西斯侵略力量，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起伏变化。这两件大事使人类为此付

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从这两件重大事件中学到了什么？这些经验教训和米瑟斯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何关系？这是今天我们讨论这本《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所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争论的大题目。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的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世界上近二十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当人们觉悟之后，幡然悔改，但在返回到米瑟斯指出的自由经济的道路上只有我国比较幸运，别的许多国家继续经受着经济上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煎熬。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米塞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1 月出版

然而可悲的是七十年以后的今天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认清了自由经济的优点和计划经济的缺点。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管总比不管好。尤其是人们深信人类可以改造自然，当然更可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己。自由经济中发生了那么多的问题，盲目竞争，坑蒙拐骗，贫富差距，环境污染，难道不该去管吗？要求管好经济的呼声始终是非常强烈的。这种管经济的想法很自然地容易转

化为计划经济的主张。所以我仍怀疑，计划经济对人类仍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拐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去的可能。

税收、货币、环境、市场秩序等等无疑都是要有人去管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位聪明而正直的人，不但以上这些方面应该让他管，连物价、生产、分配也应该让他去管。有了这么一位万能公正的主管，人们再也用不着为经济生活的各种问题犯愁了。没有人能够否认，一个好的计划经济比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更好。可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计划经济而不是一个糟糕的计划经济呢？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位万能公正的人呢？用什么方法可以鉴别某人是不是达到了那样的水平呢？更不必说如何保证这样的人能被置于领导国民经济的位置上，而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的人在那里瞎指挥呢？在现实生活中，两个方案孰优孰劣这种简单的问题都往往难于判别，何况复杂的经济问题呢？自由主义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的困难，所以强调了保留人们选择自由这一极端重要的基本原则，在满足这一原则条件下，经济是应该有管理的。

米瑟斯的这本书充分阐述了自由主义的主张，和在财产、平等、政府、外交、移民、垄断、议会、政党等方面应该有的政策。它是一本完整的政策声明。但根据后来七十年的经验来看，人们普遍对自由主义有一种深刻的误解。米瑟斯在这本书中并未预见到这一点，因而未能一针见血地把人们的这种误解驳回去。在这本书中，米瑟斯甚至未曾清楚地说明他的这些主张和自由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联系。

按字面上的理解，自由就是不受拘束，因此自由主义就是人人都可以不受拘束地自由行动的一种主张。这正是一般人从字面上所认识的自由主义。于是自由主义就成了无纪律、无组织、自由散漫的代名词。这实在是自由主义莫大的曲解。

诚然，自由主义是要保证每个人都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每个人的行动有所约束。决不是无约束的自由散漫就可以造就一个对每个人都能保证自由的环境的。所以自由主义不是不要管制，但管制是为了保证每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主义强调每个人都应尊重别人的自由，从而使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充分的自由。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一种信念是要使社会得到治理，每个人都要放弃个人自由。同样是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但约束的目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而管制主义者看来，经济本来就是要管，不管就要出乱子。在法律理论上与此可以相比拟的两种理论是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前者认为只要法律上没有禁止的，人们都有权去做，这对应于自由主义；后者认为只要法律上没有规定可做的事，做了统统都是违法，这对应于管制主义。

米瑟斯也反对无政府主义，他明确地指出：“没有强制措施，社会就会面临危险；为了保障人们的和平和合作，必须制定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必须保留暴力和威慑手段，只有这样才不致使任何人破坏社会秩序。”可见他的主张和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完全是两回事。

人们对自由主义的误解，从更深的层次看，是混淆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社会自由，即整体上保证个人的自由。它要求于每个人的，不是只顾自己的自由，而首先是尊重别人的

自由。片面的个人自由作为一种主张事实上是行不通的，逻辑上是矛盾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不受约束地自由行动，势必造成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结果是谁都得不到自由。只有从整体上坚持自由主义，才会有个人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的精髓。

另一个混淆个人和社会的例子是市场经济中个人追求自利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得到承认的，而且正是市场经济之所以充满活力的原因。从计划经济时代否认个人利益到市场经济承认个人利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是个人追求利益必须承认别人作为个人也有追求利益的权利，而不是只有我才有权利追求利益，别人的利益统统都要让路。所以市场经济是每人都尊重别人的利益，从而每人的个人利益能得以实现，如今我们见到的各式各样的市场经济中的毛病绝大部分是不尊重别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侵犯了别人的利益造成的。正如对自由的理解，片面从个人自由去想问题，造成了个人之间行动的冲突。

上面谈的从个人自由出发到社会自由，以及从个人利益出发到社会利益，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正是人与人的地位的平等，这是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基础。在市场上人与人是对称的，平等的，没有任何人处于特殊的地位。市场上任何特权势必破坏市场规则，人的自由和利益将受到特权的侵犯。所以建立市场规则的根本点是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

米瑟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鲜明地提出：“自由主义是第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有人不理解他所赞成的资本主义，以为他一定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然而他在书中写道：“资本家若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这一段话听起来不但不像一般人头脑中的资本主义，倒是更像一般人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而在米瑟斯，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只是指公有制，而并不是社会公平、福利和阶级和谐。

米瑟斯不赞成公有制，因为他认为，公有制“不可能对经济进行核算”。他指出：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这种制度不了解商品和劳务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律，同样也不认识较高级别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本世纪以来微观经济学的最主要的成就，可以说，就是通过严格推导得出的下述结论：供需均衡的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最有效地配置。而供需均衡价格是生产方追逐利润极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极大化的动机下达到的。换句话说，只有生产方和需求方利益对立的情况下才有均衡价格的出现。在全面公有制情况下，企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他的产品价格如果定得太低出现了亏损，这无关紧要，因为人民享受了低价的商品；如果产品价格定得太高出现了盈利，盈利最终上交国家，仍旧用之于民，同样无关紧要。于是价格只起会计记录的作用，不起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正是我们过去三十年计划经济中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价格混乱使得国民经济失去了参考坐标。无论多聪明的人失去了价格信息就不可能制订出一个正确的经济计划，连一种商品该进口还是该出口都弄不清。我们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有价格系统的经济环境中，以致于不觉得这个价格参考坐标的重要性，它实际上左右着人们的一切经

济行为，正像我们习惯于生活在地心引力场中，以致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样。

人类必将面临日益枯竭的各种自然资源，同时人的欲望却永远不会满足。因此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人类社会中的永恒课题。克服稀缺性的方法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经济学给我们指出，均衡价格引导下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所以克服稀缺性的根本手段是市场机制。试比较一下我们一贯认为的：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将提供越来越丰富的产品。究竟是均衡价格和市场机制能克服稀缺性，还是科学技术能克服稀缺性？我认为二者都不可缺。但更根本的还是市场机制。因为市场会激励人们去从事必要的科技研究，研究得到的成果会通过市场中的分工合作而推向应用。或者说，市场本身会推动科技进步。它尤其能防止不能商业化(不能赚钱)的科技发明被广泛采用，因为这一类发明不是节约了社会的稀缺性，而是浪费了稀缺性，不论这种科技发明有多新奇，多巧妙。相反，如果没有市场作为背景，一批由国家分配去做科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声称一项发明是有利于社会的，可是没有人能够判断这项发明是否真正值得推广。这一类的成果鉴定会我们曾开过许多次。可是它的能力远比不上市场的激励效力。米瑟斯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也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彻底且纯粹，所以看不惯任何别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他们都是软弱且缺乏原则性。这样固然有助于将他的理想构建得更能自圆其说，但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例如他对自由移民的态度即使在学理上讲得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接受他的迁徙自由的主张。他不畏孤立，不向世俗低头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钦佩。他在四十多岁时完成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构想，在以后的四十多年中又亲眼目睹了希特勒的上台，二次大战的爆发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付诸实施。可是他的许多宝贵思想非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很少有人接受，甚至到一九七三年他逝世时仍是曲高和寡。他是在不得志的寂寞中含恨而去。一直到原苏联解体，他死后的十七年，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才重新被人认识。

米瑟斯之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也是他本人的严重缺点所致。他处处批评别人懦弱和妥协。可是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由不妥协且勇敢的人所组成，恐怕造成的纠纷比今天还要多得多。他批评别人缺乏原则性，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像他那样不尊重别人的原则，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原则，世界上的战争还会更多一些，而且战争一旦打起来，除非一方被消灭，它永远也不会通过妥协而停战。米瑟斯的这种作风，违背了他自己提出来的自由主义的最高原则，即尊重别人的自由。但是我们今天这样指摘米瑟斯，未必真正有理。因为这不是米瑟斯的悲剧，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自身注定难以成功的悲剧。世界上的专制主义注定是行得通的，只要你有足够的武力。但自由主义要想贯彻，只有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懂得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自己的自由才有保证的道理。我想这是我们从米瑟斯一生活动可以得出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一日

[【返回目录】](#)

茅于軾教授九十岁寿辰学术庆祝活动众筹

一、背景与意义

茅于軾教授生于 1929 年 1 月 14 日。原为铁路工程师，后自学经济学，1985 年发表《择优分配原理》。1993 年与几位经济学家和大象文化公司共同创立天则经济研究所。其后又创立了富平保姆学校和人文经济学会。他的道德文章，君子人格，为一代师表。

2019 年 1 月 14 日，将是茅于軾教授 90 岁寿辰。借此机会举办一次庆祝活动，一来表达我们的敬意，二来学习他的理论思想。具体形式就是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以他的学术著作及其它论著为主，研讨茅于軾教授的学术和思想贡献。

二、具体形式

1. 2019 年 1 月 14 日，举办“茅于軾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庆祝他九十岁寿辰活动”；时间一天，参加学者 20 名，参会人数 100 左右人；
2. 编辑印刷《茅于軾教授九十寿辰庆祝画册》。

三、拟邀请嘉宾

茅于軾教授在经济学界，法学界，其它学术界，企业界的朋友；天则所的同事，曾经在天则所工作过的人士；等等。

四、筹款目标

30 万元人民币

五、截止日期

2018 年 12 月 14 日

六、众筹形式

众筹回报包括：

1. 600 元

参加“茅于軾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庆祝他九十岁寿辰活动”；
获得《茅于軾教授九十寿辰庆祝画册》一本；

2. 18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 [茅于軾《择优分配原理》发表 30 周年] 学术研讨会纪念品;

3. 50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 《茅于軾思想集萃珍藏版》光盘 1 套;

4. 300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与茅于軾教授一起合影并喝茶的机会

5. 1000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茅于軾教授的墨宝一幅。

五、捐款方式

(1) **银行账户：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账号：861581962310001

(2) **支付宝账号：** xueruijie@unirule.org.cn

(3) 汇款请留下联系方式，并注明“茅老 90”。

(4) **联系人：**

李 冰：13601286718, libing@unirule.org

胡明东：15011147717, humingdong@unirule.org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3万元（2018-2019年度4-5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 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 (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 (每期沙龙仅一位): 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 (全年仅一位): 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 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 861581962310001 (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 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 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 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微博: 云豹 ONE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lllI-5ehNtyrler9dKw> 密码: t9ed